学校代码：10052
学　　号：s020158

中央民族大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辽代契丹境内语言文字使用情况探析

姓　　名：　　陈文俊
指导教师：　　丁石庆、张铁山
院系（部所）：　　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
专　　业：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完成日期：　　2005年5月1日

摘　　要

本论文以辽代契丹境内的语言文字（主要是契丹语、契丹文，兼及汉语、汉文等）为研究对象，对其使用情况作系统分析。

论文工作的目的和意义：虽然有关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早已不是一个新的领域，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外学者致力于此，但一般是重于文字轻于语言、文字中重于解读轻于综合研究，而且材料局限于契丹大、小字这样的死文字，研究起来困难很大、进展缓慢。过往的研究大多只在语言和文字本体上下功夫，虽然有价值但困难巨大，也挡住了更多学习者想要致力于辽代语言文字研究的脚步。随着语言学、文字学领域的扩展，借鉴于此，本论文从双语学、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不单单只重契丹语、契丹文的本体研究，而且考虑它们的使用状况，从使用者、使用地域和使用项目出发，将死的语言文字变为活的来考察，同时考虑当时当地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情况，相信是对高深的解读工作的一项有益补充，而且许多学者也早已在这些方面有所开端。同时，也为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提供了一些补充研究，对于今天契丹后裔民族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定团结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研究方法：关于辽代语言文字的相关记载分散于各种古籍之中，重要的有《魏书·契丹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辽史》、《辽史拾遗》、《契丹国志》等。本论文将零星的辽代语言文字资料汇集，并参考相关研究著述，在此基础上运用分类的方法对语言、文字、语言应用的实例进行独立、系统地研究。同时探讨契丹语言文字在与其他民族语言文字共存的状况下对于辽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于语言文字发展的影响。

研究成果和新的见解：辽代契丹政权境内是以契丹民族为主体、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区域，契丹在历史上曾两次创造自己的文字，其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相对复杂，文章从语用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契丹境内语言文字的基本状况。论文由 5 部分构成。

第一章 引言。简要介绍了以下情况：辽代及契丹民族的历史，辽代语言文字的研究动态，论文的理论依据以及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章 辽代契丹境内的语言使用情况。本章介绍了契丹语的基本知识及其应用范围，契丹境内的其他语言及其应用范围，并将契丹境内的双语类型分为契丹－汉型和汉－契丹型，契丹境内语言情况的地理分布，最后通过辽代语言政策的变化来认识民族政权语言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章 辽代契丹境内的文字使用情况。从契丹文字的创制，契丹文字在时间、形式和人员上的使用范围，其他民族文字在契丹境内的使用情况，分析得出契丹文的消亡主要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及语言与文字发展不协调所致。

第四章 辽代契丹境内语用特例及其形式举隅。从避讳、诗歌、散文、书禁政策四个方面来看语言文字的发展状况，分别得出认识。

结语。总结了辽代契丹境内语言文字使用发展的规律。

关键词： 契丹，语言，文字，语用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within the Khitan's in Liao dynasty as the researching object and makes a systems analysis in the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Purpose & signification: Although the research about the Khitan's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is not a new field, there are lots of scholars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pplying themselves to this field. Commonly, their research is important in character and is not important in language .In the language, it is important in explanation and is not important in systemization. Moreover, the materials are only localized in Khitan Dazi and Khitan Xiaozi which is dead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is very difficult and the evolvement is very slow. The old study only takes attention in the reality of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which have a new value and a big difficulty, and also ward off the more learners to study the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in Liao dynasty.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he realm in linguistics and character, use for reference,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bilingual, social and culture study, not only to consider reality research, but to consider the use, including the user, the area of use and the item of us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dead language as the alive language for research. It also considers the other peoples' languages. I believe this study is an available makeup for explanation. Furthermore, great deals of scholars have already begun to study in these facets. At one time, this article offers some makeup to linguistics, character, folk and history. It also has realistic value in Khitan's descendants and the whole Chinese people.

Method: The correlated recordation about the Liao dynasty's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disperse in kinds of ancient books. There are "Wei Shu","Xin Wu Dai Shi", "Liao Shi", "Liao Shi Shi Yi", "Qidan Guo Zhi"and so on. I influx dispersed data about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and consult correlated writings. Under the base, I exert the classified means to research language, character and appli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 discuss the influence about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Khitan and other peoples'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And also I discuss the infection in the social and culture circumstance for the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Production & new view: Within Khitan's territory, there are Khitan people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living together in Liao dynasty. In history,

Khitan had formulated two kinds of its national characters. So its condition of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using is more complicated.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bilingual pragmatic to discover the fundamental general situation of the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The paper makes up of five chapters.

Part I: Foreword.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history about Khitan, the research trends about languages and characters, paper's theoretic gist and the questions which need to solve.

Part II: The use of the languages within the Khitan's boundary in Liao dynasty.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applied bound about the Khitan's language. Then it disparts the bilingual type into the Khitan-Han type and the Han- Khitan type. Also it introduces the geography and the policy about the languages.

Part III: The use of the characters within the Khitan's boundary in Liao dynasty.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creation of Khitan's character, the bound of use and other peoples' characters. The article also believes the Khitan characters' dying out is the rule of the characters' own and the unbalance of the rel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Part IV: The special case of the pragmatic within the Khitan's boundary in Liao dynasty. This chapter introduces the dodge, poesy, essay and the policy in banning book about Liao dynasty.

Part V: Epilogue.

Key words: Khitan (Qidan), language, character, pragmatics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1
第一节　辽代及契丹民族……1
一、契丹族属……1
二、契丹族简史……1
三、契丹政权的国号……2
四、辽代分期……2
五、辽的疆域……2
六、研究辽史的典籍……3
第二节　辽代语言文字的研究动态……3
一、关于契丹大小字的讨论……3
二、关于契丹文字资料的出土和公布……3
三、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和研究……4
第三节　本文的理论依据……5
一、文化理论……5
二、文化语言学理论……5
三、双语学理论……5
四、文字学理论……5
第四节　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6
第二章　辽代契丹境内语言使用情况……7
第一节　契丹语及其使用范围……7
一、概况……7
二、方言……8
三、语音……8
四、词汇……9
五、语法……10
六、语言系属……10
七、应用范围……11
第二节　契丹境内的其他语言及其使用范围……12
一、辽朝历代帝王、皇族及臣工、列女……17
二、契丹人译员（通事）……18
第三节　契丹境内的双语类型……18
一、契丹—汉型……18
二、汉—契丹型……19
第四节　契丹境内语言情况的地理分布……20

一、契丹境内民族、地理分布……20
二、契丹境内语言区域划分……21
第五节 辽代语言政策的变化及评价……21
第三章 辽代契丹境内文字使用情况……23
第一节 契丹文字的创制……23
一、契丹文字创制的背景及意义…… 23
二、契丹大字的创制……24
三、契丹小字的创制……24
四、契丹文字的创制方法及举例……25
第二节 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26
一、契丹文字在时间上的使用范围……26
二、契丹文字在形式上的使用范围……27
三、契丹文字在人员上的使用范围……28
第三节 其他民族文字在契丹境内的使用情况……29
第四节 契丹境内文字的走向与消亡……31
一、从文字本身发展的规律看……31
二、从与汉文字的关系看……32
三、从语言和文字的相互关系看……33
第四章 辽代契丹境内语用特例及形式举隅……34
第一节 避讳……34
第二节 诗歌……36
第三节 散文……38
第四节 书禁政策……39
结语……42
参考文献……44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47
后记……48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49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辽代及契丹民族

一、契丹族属

关于契丹族来源及其族属，学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①]：

1、《魏书》、《通典》认为契丹与东部宇文有关。

2、《新唐书》、《新五代史》、史氏《亡辽录》、叶氏《契丹国志》、程氏《北边备对》认为契丹源于东胡，由东胡而鲜卑。

3、《辽史》认为契丹族是轩辕之后，是宇文鲜卑的一支，而鲜卑与匈奴相异。

4、《旧五代史》、《册府元龟》、《宋会要·蕃夷》、路振《九国志》、庞元英《文昌杂集》认为契丹源于匈奴。

学界目前较为认可的一种观点是：契丹就族属而言,源于东胡系，由东胡而鲜卑，由鲜卑而契丹。契丹种族渊源的简单图示如下：

↗慕容氏

↗鲜卑→宇文氏→契丹

东胡（战国、秦汉）　　↘段氏

↘乌桓

二、契丹族简史

契丹出现在历史上的确切年代为公元 378 年。“（高句丽小獸林王）八年（378）……九月，契丹犯北边，陷八部落。”[②]中国史上关于契丹历史的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说：“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竄于松漠之间。”[③]然后是《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开始对契丹列有专章，以后宋人叶隆礼所撰《契丹国志》为契丹写有专著。

契丹初附宇文部，至公元四世纪中叶宇文部为前燕攻破，始分离而成单独的部落，自号契丹。北魏以来游牧于潢水（今西拉木伦河）、土河（今老哈河）等地。北魏时有八部，分别与北魏通贡互市。隋时有十部。唐初至开元中仍为八部，以大贺氏为部落联盟首领。贞观中，唐置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开元中至唐末，以遥辇氏为首领。唐末，迭拉部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及邻近部族。契丹族受汉族等影响，农业、手工业有较快发展。

辽是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一个王朝。916 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建都皇都（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太宗耶律德光大同元年（947 年）灭后唐，建国号大辽，改皇都为上京。辽圣

---

①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 28－29 页。

② [韩国] 金富轼著，李贞培校勘.《三国史记》：卷 18.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发行，1982.第 140 页。

③ [北齐] 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第 2223 页。

宗统和二年（984 年）改国号为大契丹国，建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辽道宗咸雍二年（1066 年）复号大辽。保大五年（1125 年），天祚帝被金军俘掳，辽亡。传九帝，二百一十年。习惯上自 916 年契丹建国至 1125 年为女真所灭，统称为辽朝。从此契丹人再也没有自己的国家，然而作为一个种族依然存在。辽亡后，耶律大石西迁到中亚楚河流域，重建辽国，史称西辽。1211 年，乃蛮部屈出律篡位，1218 年为蒙古所灭。此时，契丹人作为一个单一种族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这无疑是由于在元朝鼎盛之时曾经掀起了蒙古化高潮，契丹人除一部分被汉化以外，其余尽被其同化浪潮所淹没而靡有子遗。

三、契丹政权的国号

值得一提的是辽的国号，汉文典籍中明确记录了契丹政权国号的更换，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称“契丹”与称“辽”的时间大致相当，各约一百年。何时称“契丹”，何时称“辽”，汉文的资料十分严格地遵守了，但契丹文的资料则没有。目前发现的所有契丹文资料都称“大契丹国”，没有一例是称“大辽”的，改称辽的时间里也是称的契丹，有汉文对照的资料中，汉文称辽的，契丹文称契丹。契丹文的专家刘凤翥认为，契丹人有时改国号为辽是改给汉人用的，契丹人则不用；但当世以至后世的汉人却往往将辽作为整个契丹王朝的国号，将契丹只作族名看待；辽代的两个国号既应用于不同时期，也在不同时期应用于不同人群，这是辽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两点：1、契丹人的语言习惯、文字书写的方式，包括用词用语，与汉文还是不同的，所以按照各自的习惯，契丹人称契丹，汉人称辽，“辽”更符合汉人的语言习惯和审美标准，正如“契丹”适用于契丹人一样。2、契丹人辽汉分治的政策，包括两个国号的配置以及国号的反复改换，表明了保守自己民族特点的心理。

四、辽代分期

辽传九帝，共有 210 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初创时期：太祖、太宗、世宗（916－951 年）。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政权、草创制度、开拓疆域。916 年建立契丹国；926 年灭渤海，建立东丹国；936 年吞并幽云十六州。

2、发展时期：穆宗、景宗、圣宗（951－1030 年）。穆宗号称“睡王”，无所作为；景宗稍有作为，为圣宗中兴打下基础；圣宗时，由太后萧绰辅佐，调整统治政策、重视汉族人才的选拔，1005 年与宋订立澶渊之盟赢得了 120 年的和平和发展，辽在圣宗时达到全盛。

3、衰亡时期：兴宗、道宗、天祚帝（1031－1125 年）。这时期经历了钦哀之变、滦河之变等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外部对外战争连年、民族矛盾尖锐，腐朽的政治导致辽由盛而衰、由衰而亡。

五、辽的疆域

辽的疆域在太宗时基本奠定：南部包括河北、山西的燕云十六州，至今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东北包括渤海国旧地直到黑龙江口；西北统治蒙古草原各部

落；西到甘州（今甘肃张掖）。辽朝的民族学地图：国家的北部（上京道）是契丹人传统的聚居地，南部（南京道、西京道）则分布着广大的汉人，居住在这两个区域之间（中京道）的是奚人，东部（东京道）的主要居民是渤海人。另外，在东京道和上京道北方广袤的疆域内，还分布着女真、室韦、阻卜等许多民族，但它们不在辽朝的行政辖区之内，契丹人对这些民族只是一种羁縻关系。

六、研究辽史的典籍

辽代沿袭中原文化传统，曾编修《起居注》、《日历》、《实录》和《国史》，最后由宰相耶律俨集成一代《实录》。元脱脱根据《实录》等变成《辽史》。清人厉鹗又辑成《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此为辽史研究的基本古籍，书中各处有对语言文字的相关记载，只是较为分散。近几十年来关于辽代历史的研究专著层出不穷，今人所著辽史相关著作中大都列有专章介绍契丹民族的语言文字。

第二节　辽代语言文字的研究动态

契丹文的创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它是我国东北古代民族历史上首创的文字。它对后来的女真文、西夏文、蒙古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创制，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揭开辽代社会神秘的面纱，中外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契丹语言文字的研究，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契丹大小字的讨论

史籍记载，契丹文有大字和小字两种类型。而今传世的契丹文也有两种：一种是辽太祖墓碑（残石）和《萧孝忠墓志》类型的契丹文，另一种是辽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类型的契丹文。两种类型的契丹文何为大字，何为小字，至今认识不一。金光平、曾毅公合著《锦西西孤山之契丹文墓志试释》[①]一文的摘要中指出《萧孝忠墓志》类型的契丹文是契丹大字；所以，辽庆陵出土的帝后哀册类型的契丹文就是契丹小字。学界基本同意此种观点，但是由于两种文字都没有彻底解读，个别学者仍持异议。而且对于个别契丹文资料，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认识。比方说，《大安二年□月元日之碑》被认为可能是契丹大字，但不确定；还有哲里木盟巴日哈达山洞内的题字，贾敬颜先生认为是契丹大字，而刘凤翥、冯永谦先生则认为是契丹小字。[②]

二、关于契丹文字资料的出土和公布

契丹大字见于史载的仅元陶宗仪《书史会要》中提到的“朕、敕、走、马、急”五字，转引自宋人王易《燕北录》。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契丹大字的资料大致每隔十年就出土或发表一件。如 30 年代发表的《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

[①] 金光平，曾毅公.《锦西西孤山之契丹文墓誌试释》.《考古学报》，1957，02 期。

[②] 贾敬颜.《契丹文》.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刘凤翥.《辽代语言和文字》.《博物馆研究》，1984，02 期；冯永谦.《建国以来辽代考古的重要收获》.《辽金史论集》第一辑。

静安寺碑》，40 年代发现并发表的《故太师铭石记》，50 年代出土并发表的《萧孝忠墓志》，60 年代出土的《耶律延宁墓志》和《萧袍鲁墓志》，70 年代出土的《北大王墓志》和大银钱，80 年代出土的《耶律习涅墓志》及对以前出土的墓志、钱币的拓片和印章的发表。

契丹小字的资料，如 1969 年发现的《故耶律氏铭石》，1975 年的《许王墓志》，80 年代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铭》，及同期发表的《故耶律氏铭石》的拓本照片和经过校勘的全文转抄本。还有辽兴宗及仁懿皇后、道宗及宣懿皇后四哀册，《郎君行记》石刻及各种墓志、题名、鱼符、铜镜、金银牌、钱币等都保存了许多小字的资料。

三、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和研究

学界目前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尚处解读阶段，近年来对小字的释读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对大字的研究仍然进展缓慢。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研究成果已有学者作过综述和资料汇编，如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①]，刘凤翥《最近十年我国契丹文字的研究状况》[②]，刘凤翥、于宝林《中国八十年代契丹文字研究综述》[③]等，共囊括了上百篇研究著述；1973 年 7 月刘凤翥、于宝林编撰《契丹小字资料汇辑》，1978 年 5 月又出版了由刘凤翥等主持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所编的《契丹大字资料汇辑》全面收集了现有的契丹语言文字的资料；重要的文章还有贾敬颜所著的《契丹文》[④]；清格尔泰等著的《契丹小字研究》[⑤]是仅有的少数专著之一。90 年代以来，刘凤翥、于宝林、聂鸿音等学者发表了不少学术文章，且研究领域略有扩大，也不再局限于释读，而向历史、民族、社会等方面寻求佐证。

总体上看，辽代语言文字的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历来只重文字不重语言，文字中也只重解读轻于综合研究；二是虽然关于辽代契丹语言文字的著述颇丰，但尚处于释读阶段，即其中小字的研究成果大于大字，论文的数量多于专著。多数仍是以文字解读方面的内容为主，而对辽代语用状况以及契丹—汉双语历史的研究更是空白。究其原因，一可能是由于史料本身的贫乏，有限的几则记载又散见于各种史料之中；二是由于契丹文字还未得到全面解读。本文结合史料记载，运用历史学与语言学等多学科综合手段试对辽代契丹境内的语言文字使用状况进行初步分析，进而对契丹民族创制的契丹文的历史命运做一探讨。

第三节　　本文的理论依据

---

① 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01 期。

② 刘凤翥.《最近十年我国契丹文字的研究状况》.《民族研究动态》，1983，04 期。

③ 刘凤翥，于宝林.《中国八十年代契丹文字研究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④ 贾敬颜.《契丹文》.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⑤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一、文化理论

“文化是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①]契丹民族作为一个政权虽然历史不长，但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还创制了民族文字，语言、文字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尤其契丹文字的创制更体现了契丹民族对于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适应成果。

二、文化语言学理论

语言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具有文化属性；语言又是社会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具有社会属性。辽代契丹境内的各种语言是各种文化的代表，复杂的语言状况又反映了复杂的社会交际。

语言的文化气质指的是一种语言在交际过程中使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心理上得到的某种感受，这种感受一方面受周围环境的感染，一方面则是由语言结构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而显露出来，因此，这是一个整体印象。……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文化气质。[②]契丹语也具有与汉语不同的文化气质。

语言和民族是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语言的发展变化受民族的影响和制约，语言也影响民族的发展。[③]随着契丹民族的发展壮大也变化着契丹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变化，受到汉化危机的契丹人也总是从保存语言的角度来保存自己的民族。

三、双语学理论

兼通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被称之为“双语人”或“多语人”，这种兼用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现象被称之为“双语现象”。[④]双语现象在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交流、吸收、融合、互补的最直接的体现。双语人是两种文化交流的先行的使者。[⑤]

辽代契丹境内主要生活着契丹、汉两个民族，主要存在着契丹、汉两种语言，形成了不同特性的双语使用者，本文的写作内容之一就是了解双语人两种语言、文字的使用状况。

四、文字学理论

文字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文字是一种文化工具，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相依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凝聚体。创制文字的客观条件，一是由于需要，二是有了可能。[⑥]文字是社会的产物，具有社会性，文字的发展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文字的发展还受到民族关系的制约，往往受历史民族关系的状况、民族间接触的多少、文化影响的特点等

---

①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23页。
②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66页。
③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第13、14页。
④ 丁石庆.《双语文化论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2页。
⑤ 张公瑾.《双语文化论纲·序》.丁石庆.《双语文化论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页。
⑥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第96、98、102、103页。

因素决定，而不一定受民族、语言亲缘关系的制约。[①]契丹文字是契丹民族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成果，它的产生与发展有其必然的规律。

第四节　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辽代的语言文字，以往的研究大多只考虑到契丹语和契丹文，忽略了辽代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存在和作用，鲜有将契丹语和契丹文置于多民族语言和文字的大环境中考察；此外，关于契丹语和契丹文的研究方面，又集中于解读方面，多从契丹大、小字这样的死文字入手，由文字再来推敲语言，这样的研究很有价值，但是困难很大。

本文在时间上集中于辽代，空间上集中于契丹境内，分别从语言、文字、语用实例三个方面开解辽代契丹境内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希望能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于辽代契丹境内的语言文字的研究有所补益。

一、辽代契丹境内语言文字的整体概况。包括将契丹语作为一门系统的语言进行介绍，以及介绍契丹大、小字的内部组成结构等。

二、辽代契丹语言和文字的使用情况。包括语言文字的使用地域、人口、场合等方面。这些都是从社会的因素而非语言文字本身的因素入手考察语言文字的情况，这是本文的特点之一。

三、从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看辽代契丹民族的汉化程度。民族之间的接触和影响最主要的是文化上的接触和影响，而语言和文字既属于文化本身，又是文化接触和影响的最重要的工具，因此最能反映民族之间的影响程度，因此可以从语言文字的角度看契丹民族的汉化程度。

[①] 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第184、185页。

第二章 辽代契丹境内语言使用情况

第一节 契丹语及其应用范围

一、概况：契丹有本民族的语言，汉文史书上称其为“北语”、“胡语”，契丹语是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与当时其他民族的语言颇不相同。《辽史拾遗》上说：“（契丹）政教不通，言语嗜欲不与华同。”[①]《辽史·皇子表》说：“回鹘使至（辽国），无能通其语者。”[②]《辽史·国语解》说：“辽之初兴，与奚、室韦密迩，土俗言语大概近俚。”[③]《五代会要》中记载奚族“语与契丹小异”。[④]《辽史·耶律曷鲁传》说：“契丹与奚言语相通，实一国也。”[⑤]可见，契丹语与汉语、回鹘语有较大差异，而与奚语、室韦语比较接近。分析原因，主要是种族和地域使然。

民族演化关系图示

华夏族 —汉族（宋）[汉藏语系民族]

东胡 —乌桓

鲜卑—慕容氏

宇文氏—契丹（辽）…达斡尔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段氏 奚

乞伏氏

拓跋氏

室韦……蒙古 [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

丁零（或狄）—铁勒……回鹘……维吾尔 [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西匈语支]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由图可知，契丹与奚的关系最近，同属鲜卑宇文部，奚生活在契丹东北，大部分时间臣属于契丹，所以语言几乎相同；室韦是东胡后裔、蒙古族的先民，属东胡系统，语言与契丹近似，室韦人生活在契丹以北，契丹人把室韦人称作“阻卜”，这也是契丹语中很多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的原因；当时的回鹘人生活在西域广袤的土地上，是汉代丁零人的后裔，语言与契丹差异就很大；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人所操的汉语与契丹语的差异就更大了。这种关系从今天按语系划

---

① [清] 全祖望.《辽史拾遗·全序》. [清] 厉鹗.《辽史拾遗》. 广雅丛书本，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 第 1 页。

② [元] 脱脱.《辽史·皇子表》：卷 64.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968 页。

③ [元] 脱脱.《辽史·国语解》：卷 106.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1533 页。

④ [宋] 王溥.《五代会要》：卷 28. 北京：中华书局，1998. 第 345 页。

⑤ [元] 脱脱.《辽史·耶律曷鲁传》：卷 73.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1220 页。

分的民族和民族语言中也可见一斑，大多数学者认为今天生活在东北和内蒙地区的达斡尔族是契丹的后裔，蒙古族是室韦的后裔，达斡尔语和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往上推演，所以契丹与室韦语言可以相通；身为回鹘后裔的维吾尔族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所以契丹语与回鹘语的差别大致是语族上的分别，而与汉语则是语系上的差别，一为阿尔泰语系，一为汉藏语系。

二、方言：契丹语还有方言的区别，《辽史·耶律觌烈传》附传中提到："（耶律羽之）通诸部语。"[①]可见契丹诸部语言有所差别，可以视为方言的差异。方言的差别源于契丹部族的分化和发展，契丹在北朝时分为八部，隋唐时期分为十部（一说唐时为八部），加之战争掠夺人口致使契丹内部民族成分更加复杂，各部又各有居所，所以语言也略有差别。至唐末，迭剌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并建立辽国，但由于疆域辽阔，国家政府也未如今天一样推广民族普通话，契丹语的内部差别依然存在。

三、语音：目前可供研究语音的材料只有《辽史·国语解》一篇。于宝林先生在其论著《契丹古代史论稿》中将契丹语语音的特点总结如下[②]：

1、契丹语无送气音（或不分清浊音）；

2、契丹语无舌面音；

3、契丹语无卷舌音；

4、契丹语中存在［n］、［l］不分的现象。

证据也有四点[③]：

第一，汉译字"比"通"皮"，说明契丹语［p］、［p‘］不分；"达"通"挞"（还通"塔"）、"得"通"特"、"笃"通"突"、"腻"通"忒"等说明［t］、［t‘］不分；"割"通"豁"、"葛"通"阔"，说明［k］、［k‘］不分，再加上在契丹小字研究中发现音译汉字"开"、"空"声母的原字与音译"徽"声母为同一原字，这实际上说明契丹语是［k］、［k‘］、［x］不分；"契"、"奇"通"奚"说明［tɕ］、［ɕ］不分，又，契丹小字音译汉字"酒"声母的原字同"修"声母原字，说明契丹语是［tɕ］、［tɕ‘］、［ɕ］不分；"昭"通"嘲"说明［tɕ］、［tɕ‘］不分。

第二，汉译字"洋"通"桑"、"习"通"思"，说明契丹语［ɕ］、［s］不分；"葛"、"阔"通"菊"说明［k］、［k‘］、［tɕ］不分；"迪"通"纪"说明［t］、［tɕ］不分；契丹小字音译汉字"兴"、"许"不仅与"期"，也与"开"、"空"和"徽"声母原字同，说明契丹语［ɕ］、［tɕ‘］、［k‘］、［x］不分。

第三，汉译字"坠"通"遂"说明契丹语［tʂ］、［s］不分；"述"通"速"说明［ʂ］、［s］不分。

第四，汉译字"纳"通"剌"，说明［n］、［l］不分。

此外，契丹语元音特点如下：契丹语中有元音和谐现象[④]，而且还有以唇型

---

① ［元］脱脱.《辽史·耶律觌烈传》附传：卷75.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238页。

②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第264页。

③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第347页。

④ 元音和谐指的是元音在语音结构上的彼此搭配关系。即词中的几个元音，要么都是前元音或后元音，要么都是圆唇元音或展唇元音。

为转移的圆唇、展唇的和谐。

另外，聂鸿音先生在其《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一文中根据《辽史》记载的契丹人名字总结出契丹语音的一个规律：契丹语有－n 和－in 两个名词附加成分。这两个附加成分的分布表现为明显的互补关系，－n 只粘附在元音 a、e、i、o 后面，而－in 只粘附在元音 u 或辅音后面，它们在语音形式上近似于某些蒙古语族语言的属格词尾。[①]

四、词汇：1、基本词汇，由于契丹民族世代游牧于我国北方潢水和土河流域且善于冶铁，因此契丹语有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的基本词汇。如“契丹”一词，是本民族自称，语义有“镔铁”、“刀剑”、“寒冷”、“大中”、“部酋名字之演变”等[②]；契丹人称铁为“曷术”，称皇帝的行宫为“捺钵”，称文士为“林牙”，称朋友为“朝定”等等；除表示实义的词外，契丹语中还有表示抽象意义的词，辽史载：“‘阿鲁敦’者，辽言盛名也。”[③]“‘匣列’，辽言复来也。”[④]

2、姓氏，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⑤]契丹人只有耶律和萧两个姓氏，其实是从其部落名称及所居横帐名称演化而来，《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中说：“（契丹）以其横帐地名为姓，曰世里。世里，译者谓之耶律。”[⑥]有谓始兴之地曰世里，译者以世里为耶律，故国族皆以耶律为姓。又有言以汉字书者曰耶律、萧，以契丹字书者曰移剌、石抹。此外，关于契丹人名，来源也很多样，有来自部族名的，如创制契丹小字的耶律迭剌，“迭剌”是部族名，阿保机就出身于迭剌部；有来自官名的，如建立西辽的耶律大石，“大石”是官名，相当于宋朝的太师。

3、借词，契丹自北魏时起就与周边许多民族有着经济文化交往，曾经辗转臣服于唐朝和突厥之间，还有部分契丹人内迁与汉族杂居，因此契丹语中存在许多其他民族语的借词。例如契丹语“详稳”、“令稳”、“常衮”、“大石”、“敞史”都是汉语的音译借词，分别借自汉语“相公”、“令公”、“将军”、“太师”、“长史”；又《辽史》记载：“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胡俚堇’，尊称曰‘耨斡糜’，盖以配后土而母之云。”[⑦]可知，“可敦”是突厥语借词。契丹语中突厥语借词还有“斡鲁朵”、“夷离堇”、“挞马”、“惕稳”等，其汉义分别是“宫帐”、“军事首长”、“扈从官”、“掌皇族事务的官员”。这是因为契丹在古八部时曾依附于突厥、回鹘，由于契丹本身缺乏制度经验，突厥文化、制度传入契丹对其产生深远影响，所以后来部落联盟时期以致辽初建之时的官号大多借自突

或后元音，要么都是圆唇元音或展唇元音。

① 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民族语文》,2001,02 期。

② 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第 2 页。

③ [元] 脱脱.《辽史·耶律曷鲁传》：卷 73.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1221 页。

④ [元] 脱脱.《辽史·韩延徽传》：卷 74.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1231 页。

⑤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族姓原始》：卷 23. 扫叶山房校刊.第 1 页。

⑥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卷 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888 页。

⑦ [元] 脱脱.《辽史·后妃传》：卷 71.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 1198 页。

厥和回鹘，包括后来又有许多官号借自汉族。

五、语法：契丹语是一种以多音节为主，有词形变化的语言，只写一个“”（汉字“天”）字却要念做“腾格里”，只写一个“”（汉字“马”）却要念做“母林”，而且在句子中间，读音还必须按照词语的语法地位（主格或宾格）有所改变[①]；同时还有时、数、格的变化，利用粘着词尾表示语法关系。

关于契丹语语法只留下一则材料，洪迈《夷坚丙志·契丹诵诗》中提到：“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如契丹人会将“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念作“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②]虽然是契丹儿童学习汉语的方法，也可从中看到契丹语语法与汉语语法的区别，如语序不是主谓宾结构而是宾主谓的形式，而且双音节词、多音节词较多，单音节词较少。关于这则材料，一般的看法是，契丹语的读法是倒装，存在宾语前置现象；但也有其他意见，如聂鸿音先生在《〈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一文中指出：契丹小儿在学汉语时往往会无谓地颠倒两个等立分句的次序，这种现象在西夏人翻译汉语文献时也曾出现，它应该是当时初学者的共同习惯。[③]又认为，这段话反映了大部分汉人对契丹语的初步印象——契丹的语序和汉语是相反的。若从语言的一般规律看，把“明月”说成“月明”，把“敲门”说成“门子打”都是可能的，唯独不可能出现并列的句子前后颠倒的情况。所以估计洪迈所记并非事实，而是中原人故意夸大以至歪曲了契丹语的特点，编造了这个笑话来取笑契丹人。[④]

六、语言系属：今天的语言学家根据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认为按谱系分类的方法，契丹语应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保守一点的说法是认为它接近于蒙古族语和满洲通古斯语族。

首先，直接的证据是以上对于契丹语语音、词汇、语法各项的史料以及现有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分析，基本属性是符合阿尔泰语系语言的。

其次，拿契丹语与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相比，1、与蒙古语的关系。多桑《蒙古史》卷一转引剌失德《集史》有“契丹、蒙古二族语言容貌多相类。”[⑤]契丹语和古蒙古语同源，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有一些单词的发音两者是一致或相近的，例如“马”、“龙”、“兔”、“蛇”等，根据解读成果，契丹语“马”音[muri]、“龙”音[lu]、“猪”音[uei]等十二生肖读音以及基本数字读音如“四”音[den]都与蒙古语发音雷同[⑥]。2、与达斡尔语的关系。一是有些契丹史迹的专名只在达斡尔语里保存着，如达斡尔语中有称“边堡”的专名“乌尔库”，边堡是金使用契丹人来看守备边，这个词是契丹语。此外，曾被记录下来的一些契丹语词汇包括数词和达斡尔语也是相同的；二是契丹语的语序和达斡

---

① 聂鸿音.《塞北三朝》.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35页。
② [宋] 洪迈.《契丹诵诗》.《夷坚志·三丙志》：卷1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③ 聂鸿音.《〈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满语研究》,2001,02期。
④ 聂鸿音.《塞北三朝》.北京：中华书局,2001.第72—73页。
⑤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81页。
⑥ 刘凤翥.《契丹文字讲授提纲》。

尔语的语序相同；三是达斡尔语中保存了契丹人当时的用语，契丹人用自己的语言所取的名字和达斡尔人名也有相同的。[①]显然与阿尔泰语系语言存在同源关系。苏联《民族学杂志》根据语言的分析讨论契丹族属问题，他们总结说："契丹应该看作是古代蒙古系统的民族，它的遗裔即现代的达斡尔人。"可见从语言系方面看，已经肯定了契丹、达斡尔的直接联系。[②]

再次，从语言的文化气质看，也非常符合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整体风格。上文提到过张公瑾先生关于"语言的文化气质"的概念，指的是语言在交际过程中使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心理上得到的某种感受，这种感受受周围环境的感染，由语言结构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而表露出来，是一个整体印象。并且将语言大致分为强悍型、庄重型、敦实型、活泼型、娇柔型，认为按照对语言的接触中所得到的感受来说，蒙古语可算作强悍型，藏语可归入敦实型。[③]无独有偶，辽朝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曾对姚坤说过："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④]依阿保机的感受，契丹语在气质上是很强悍的，这与蒙古语相似，比较之下汉语则显柔弱。可见，契丹语、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藏语属于汉藏语系，从语言的文化气质和风格上也可见一斑。

七、应用范围：语言的使用包括三个方面，语言的使用场合、语言的使用人群和语言的使用类型。

1、契丹语的使用场合

《辽史 国语解》序云："史之所载，官制、宫卫、部族、地理，率以国语为之称号。"[⑤]可知，在政治、地理、制度等涉及传统的方面，契丹人顽强地保存了自己语言的词汇，这样的词语不仅存留在口语中，当它需要书写时，仍然保留着契丹语言的原味，只用汉文音译过来。这样的词还明显体现在大多数契丹族的人名中。

契丹人与契丹人的交往，契丹政权的统辖范围，从王廷到民间，人们多使用的是契丹语口语。

2、契丹语的使用人群

首先，契丹语是契丹民族的民族共同语，凡契丹人一般情况下都会说而且愿意使用契丹语，尤其是在契丹境内，契丹语是官方用语，朝廷上是必须使用的，所以从君王到臣子说的都是契丹语，会说契丹话的汉臣或是其他民族的大臣也应该用契丹话与君主和同僚交流，但不懂契丹语则也有例外，同样契丹族的百姓的生活用语也是契丹语。《辽史》中对于懂得契丹话的汉族人也有记载，提到一位

[①] [日] 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第 183 页。

[②] [苏联]《民族学杂志》. 1948, 01 期。转引自陈述.《契丹政治史稿》.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第 183 页。

[③] 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第 67－68 页。

[④]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卷 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889－890 页。

[⑤] [元] 脱脱.《辽史·国语解》：卷 106.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1533 页。

叫做王继恩的辽国宦官“聪慧，通书及辽语”[①]。此外，《全辽文》卷9大安六年作《郑恪墓志铭》云：“吾少敏达，博学世俗事，通契丹语，识小简字。”[②]

其次，还有许多来辽国学习的外族甚至是外国人，他们学习的目的是与辽进行交流，因为辽国在当时是非常强大的。日本、高丽都曾派人来辽地学习，这些外族或是外国人也是契丹语的使用者之一。

再次，各国的使者以及各国培养和委任的针对辽国的通事，即现在所称的外交人员和国内的翻译人员，也是契丹语的使用者之一。

3、契丹语的使用类型

契丹人将自己的语言发挥到很多领域，比如歌曲、诗歌、散文等等。契丹人有自己的歌曲，《契丹国志》上提到契丹人夜晚唱“番歌”，“夜以五十人番值，四鼓将尽，歌于帐前，号曰聒帐，每谒拜木葉山，即射枒枝诨子唱番歌。”[③]《辽史·乐志》载：“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④]此外，配合各种乐曲、舞蹈还有专门的歌者进行演唱，如铙歌等。可知，契丹族用自己的语言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民歌词作，下至普通百姓，上至皇族贵戚，都十分喜爱并乐于传唱。关于诗歌和散文，由于内容繁杂，将在第四章专节论述。

第二节　契丹境内的其他语言及其应用范围

契丹语是契丹人的母语，除此之外，汉语是当时最热门的外语。首先，契丹早在北魏时期就有部分内迁与汉族杂处，直至宋，契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不断爆发战争、相互之间的朝贡以及边境上的商品交换；其次，战争中契丹掠夺了大量汉族人口，尤其是辽太宗时期又占据了幽云地区；再次，在与辽政权对峙的政权中，汉族人建立的宋政权是当时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汉文化的丰富发达对其他民族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此，一方面基于契丹民族自身的发展需要，特别是辽政权建立之后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迫于各方政权分立和斗争的复杂局面，为了顺应时代的要求，契丹民族对汉语的学习都是重要的内容。

下面，从几类具有特殊身份的契丹人身上来看待这一问题，以期对契丹民族的汉语水平作一简单了解。

表1：辽代人物及其行状总表

[①] [元] 脱脱.《辽史·宦官传》：卷109.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1480页。

[②] 陈述.《全辽文·郑恪墓志铭》:卷9。转引自黄震云.《辽代文史新探》.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第41页。

[③]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宫室制度》. 扫叶山房校刊. 第4页。

[④] [元] 脱脱.《辽史·乐志》：卷54.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881页。

阶层	民族	“好学，善属文”者	备注（明确关于语言的说明）
辽帝（9位）	契丹（耶律氏）	7位（占78%）	耶律阿保机会汉语。
皇子（40位）	契丹（耶律氏）	4位（占10%）	耶律迭剌会回鹘语。
			耶律只没通汉字，能诗。
公主(36位，有名(名字）者31位）	契丹	未提及	
后妃（20位）	契丹（18位，萧氏）	2位（占11%）	
	回鹘(1位，述律氏）		
	汉（1位，甄氏）		
宗室（7位，其中4位是皇子）	契丹（耶律氏）	4位（占57%）(2位是皇子）	
臣子（272位）	契丹（213位，占78.3%）	34位（占15%）	只有萧阳阿、耶律庶成、耶律蒲鲁、萧乐音奴、萧韩家奴五人明确指出通汉文。(占2%）
	汉(51位，占18.7%）		
	渤海（4位，占1.5%）		
	奚（2位，占0.7%）		
	回鹘（1位，占0.35%）		
	吐谷浑(1位，占0.35%）		
列女（5位）	契丹（4位）	2位（占50%）	
	汉（1位）		

说明：（1）上表所列为《辽史》中有本纪、列传或表（《皇子表》、《公主表》）中出现的人物，《辽史》本身一人多传、两人一传的讹误情况未作考察，制表目的是为反映大致状况，用为文章观点的佐证，数字如有不精确之处，还望见谅。

（2）“好学，善属文”为《辽史》中对为之立传之人文化才能给予评价的常用字眼，因《辽史》对于为之立传者凡有文化特长之处，一般都有文字记录，所以用于表中，凡《辽史》所记有文化修养者均计算在内。

（3）此为总表，有关细节详见下属表格。

（根据《辽史》，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表 1-1：辽帝世系及语用情况表

世次	帝号	所出	汉名	契丹名（字，小字）	汉语掌握情况	出处
辽一	太祖[①]	耶律氏	亿	阿保机[②]，啜里只	阿保机善汉语。	《旧五代史》第 1831 页。
二	太宗	太祖子	德光	德谨，　尧骨	通汉语	
三	世宗	太祖孙，父义宗倍	阮	兀欲	通汉语	
三	穆宗	太宗子	璟	述律		
四	景宗	太宗子	贤	贤宁，　明扆	通汉语	
五	圣宗	世宗子	隆绪	文殊奴	幼喜书翰，十岁能诗。	《辽史》第 107 页。
六	兴宗	圣宗子	宗真	夷不堇，只骨	好儒术，通音律。	《辽史》第 211 页。
七	道宗	兴宗子	洪基	涅邻，　查剌	通汉语	
九	天祚帝	道宗孙，父顺宗浚	延禧	延宁，　阿果		
	（北辽）	兴宗第四孙	淳	涅里	笃好文学。	《辽史》第 352 页。
	（改元神历）	天祚皇帝第二子	雅里	撒鸾	每取唐《贞观政要》及林牙资忠所作《治国诗》，令侍从读之。	《辽史》第 354 页。
	（西辽）	太祖八代孙	大石	重德	通辽、汉字……登天庆五年进士第。	《辽史》第 355 页。

说明：（1）《辽史·本纪》中没有关于太宗、世宗、景宗、道宗四人文学行状的明确记载，

① 《契丹国志》："太祖皇帝讳亿番名阿保机。"卷 1．扫叶山房校刊．第 1 页。

② 阿保，契丹语尊称，机是名。姚坤误以保机联称。

但通过上下文的判断可以推测出四人的汉文化修养较高，是通汉语和汉字的。

（2）耶律淳、耶律雅里、耶律大石是辽被金灭后，契丹人北迁、西迁所建北辽、西辽的皇帝。

表 1－2：契丹皇室及列女文学行状表

身份	所出	姓名	文学行状	出处
皇子	德祖第三子（太祖弟）	耶律迭剌	相从二旬，能习其（回鹘）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辽史》第 968－969 页。
皇子	太祖第一子	耶律倍	聪敏好学……知音律，善书，工文章。 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辽史》第 973、1211 页。
皇子	世宗第三子	耶律只没	敏给好学，通契丹、汉字，能诗。	《辽史》第 985 页。
皇子	道宗子	耶律浚	幼能言，好学，知书。	《辽史》第 993 页。
宗室	义宗（倍）子	耶律隆先	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	《辽史》第 1212 页。
宗室	义宗（倍）子	耶律道隐	有文武才，时人称之。	《辽史》第 1212 页。
后妃	道宗宣懿皇后	萧观音	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	《辽史》第 1205 页。
后妃	天祚文妃	萧瑟瑟	善歌诗……作歌讽谏	《辽史》第 1206 页。
列女	太师适鲁之妹	耶律常哥	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	《辽史》第 1473 页。
列女	耶律中妻	萧挼兰	发心诵习（书），多涉古今。	《辽史》第 1474 页。

表 1－3 契丹族臣子文学行状表

出身	姓名	文学行状	出处
	1. 耶律敌剌	颇好礼文。	《辽史》第 1229 页。
宰相敌鲁之族弟	2. 萧思温	通书史。	《辽史》第 1267 页。
于越鲁不古之子	3. 耶律贤适	嗜学有大志。	《辽史》第 1272 页。
国舅少父房之族	4. 萧朴	以善属文，为圣宗诗友……博学多智。	《辽史》第 1280 页。
五院部人	5. 耶律八哥	幼聪慧，书一览则成诵。	《辽史》第 1281 页。
季父房之后	6. 萧阳阿	识辽、汉字，通天文、相法。	《辽史》第 1293 页。
于越洼之庶孙	7. 耶律学古	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	《辽史》第 1303 页。
耶律学古弟	8. 耶律乌不吕	善属文。	《辽史》第 1304 页。

	9. 萧柳	多知，能文……耶律观音奴集柳所著诗千篇，目曰《岁寒集》。	《辽史》第1316—1317页。
	10. 耶律合住	善谈论……智而有文。	《辽史》第1321页。
	11. 萧孝穆	目所著文曰《宝老集》。	《辽史》第1332页。
奚王楚不宁之后	12. 萧蒲奴	聪敏嗜学……不数年，涉猎经史。	《辽史》第1335页。
系出仲父房	13. 耶律资忠	博学，工辞章，……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号《西亭集》。	《辽史》第1344页。
季父房之后	14. 耶律庶成	幼好学，书过目不忘。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	《辽史》第1349页。
耶律庶成弟	15. 耶律庶箴	善属文。	《辽史》第1350页。
耶律庶箴子	16. 耶律蒲鲁	幼聪悟好学，甫七岁，能诵契丹大字。习汉文，未十年，博通经籍。	《辽史》第1351页。
仲父隋国王之后	17. 耶律韩留	工为诗。	《辽史》第1352页。
于越屋质之庶子	18. 耶律唐古	善属文。	《辽史》第1362页。
遥辇鲜质可汗之后	19. 耶律玦	重熙中，召修国史。	《辽史》第1364页。
五院部人	20. 萧铎卢斡	好学，善属文。	《辽史》第1377页。
懿族弟葛剌之八世孙	21. 耶律陈家奴	应制进诗。	《辽史》第1391页。
着帐郎君之后	22. 耶律良	进秋游赋……作捕鱼赋……奏请编御制诗文，目曰《清宁集》；上（辽道宗）命良诗为《庆会集》，亲制其序。	《辽史》第1398页。
楮特部人	23. 萧德	笃学好礼法。	《辽史》第1400页。
	24. 萧惟信	博览古今。……笃志于学，能辩论。	《辽史》第1400—1401页。
突吕不六世孙	25. 萧乐音奴	貌伟言辨，通辽、汉文字。	《辽史》第1402页。
采访使吼五世孙	26. 耶律敌烈	好学，工文词。	《辽史》第1402页。
	27. 耶律阿思	监修国史。	《辽史》第1404页。
涅剌部人	28. 萧韩家奴	少好学……博览经史，通辽汉文字。	《辽史》第1445页。
	29. 耶律昭	博学，善属文。	《辽史》第1454页。
	30. 耶律孟简	善属文。……作《放怀诗》二十首。	《辽史》第1456页。
	31. 耶律谷欲	工文章。	《辽史》第1457页。

	32. 萧文	笃志力学。	《辽史》第1461页。
	33. 耶律官奴	沉厚多学。	《辽史》第1468页。
	34. 耶律离不	自是力学，于文艺无不精。	《辽史》第1468页。

一、辽朝历代帝王、皇族及臣工、列女

《辽史》虽然是二十四史中最粗糙的一部，虽有讹误但其史料基本可信，是研究契丹历史最直接最有效的一部史书，《辽史》最大的问题是过于简略，但就是在如此简单的记载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上表所列关于文学行状的多条记录。

从表2看，帝王、皇子、公主、后妃中有才学的大致比例分别是78%、10%、0、11%，由于上述四者人员总数确定，所以比例大致可信；宗室是皇室特殊身份的成员，列女是从女子中选出的有德行的人，人员总数不是定数，而且才学出众也是成为列女的可能条件，所以57%、50%的比例只能作为参考，并不确实；臣子15%的比例数是大致可信的，因为《辽史》为之立传基本包含了有辽一代所有有名的臣子。那么，我们看到帝王有文化修养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与其治理国家的政治需要有关，其次可以看出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对于文化修养已经较为重视。但是，皇子、公主、后妃、大臣这些较之普通百姓有条件学习的人具有文化修养的比例却很低，这说明契丹仍旧保持着游牧民族重武轻文的性格，这也印证了上文提到过的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说过的："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①]这是因为契丹本是游牧民族，本身的文化积淀非常薄弱，它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来自汉族，而学习汉族的文化必须借助于汉语及汉字，所以提到的文学之士虽没有明确提出通汉语，但基本可以判断是懂得汉语的。值得一提的是契丹女子，不仅开始通文墨，而且有个别人才和作品流传下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契丹人文学创作上男女平等的精神和要求，同时汉文化的深入程度也可见一斑。

辽历九帝，均有汉名，多数以汉名流传于世，而且多数精通汉语喜好汉文及诗。辽廷中聘请很多汉族学者作为皇子甚至皇太子的老师；朝廷的国史也常常委派汉族的饱学之士来修撰；皇帝或者太后还经常命臣下在朝庭上作诗和赋，所以皇族中对于汉语的学习还是较为积极的，汉语应该是契丹境内最重要的第二语言。但其普及程度却不能算作很高，因为表2总列出的共有388人，文学之士只有51位，他们擅长的可能是汉语汉文也可能是契丹文作品，《辽史》中没有明确提到有人通汉语（阿保机娴熟汉语见于其他史书），明确提出认识及精通汉字或文的契丹人仅有耶律大石、耶律倍、耶律只没、萧阳阿、耶律庶成、耶律蒲鲁、萧乐音奴、萧韩家奴八人，按照语言、文字、文化由浅入深的学习规律，这八人通汉语的可能性很大。可知只有部分契丹上层精通契丹语和汉语，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上层中懂汉语和会说汉语的人必定有一些，但不会太多，也不一定十分精通，人数是十分有限的。

[①]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卷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889—890页。

二、契丹人译员（通事）

由于辽代契丹境内多民族的复杂状况，尤其是契丹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的严格意义上的汉人的征服，使得辽朝的统治者不得不去面对和适应领土内的多语状况。在此情况下，一种特殊的职业，也可以说是官职，应运而生。“只要一涉及口语，官僚机构中的那些不熟悉汉语的外来者们就得主要依靠译员。”[①]译员在当时称为“通事”，胡三省在对《资治通鉴》的注中说：“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国人，以知华俗、通华言者为之。”[②]按常理推断，如有精熟汉语和汉俗的契丹人，国家可能会委任通事一职，较之汉人，契丹人更受统治者信任和重用，但史书中多有记载在辽担任通事的汉人，却未见有契丹人担任此职的记载，不知何故。

此外，《辽史》中有提到耶律学古“颖悟好学，工译鞮及诗。”[③]“鞮”指古代翻译西方民族语言的人，这里的西方民族可能指西夏国的党项族以及西域各族。

除汉语外，契丹人还学习其他民族的语言。有皇子耶律迭剌学习回鹘语，还有耶律学古懂得西方民族的语言。

第三节　契丹境内的双语类型

契丹境内存在着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各种情况，境外又与北宋、西夏、大理等国对峙，所以境内外都面临着复杂的多语状况，双语、多语者也大量存在。

从双语使用者的角度大致将其分为契丹—汉型和汉—契丹型，契丹、汉之外的民族以及多语者的情况附带说明，不做专论。

一、契丹—汉型，即母语为契丹语但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者。按人们身份和对语言的熟练程度又可分为几类：1、部分契丹上层少数民族统治者精通契丹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契丹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阿保机善汉语”[④]。但他却不希望契丹臣民说汉语。可见，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契丹上层中懂汉语和会说汉语的人必定有一些，但不会太多，也不一定十分精通，因为最高决策者至少在初期并不主张学习汉语。2、契丹百姓聚居区人们的日常用语即主要用语应该还是契丹语——他们的母语，原北宋翰林学士张砺在契丹为官时曾叛逃契丹，他对耶律德光讲述叛逃原因时说：“臣本汉人，衣服饮食言语不同，今思归而不得，生不如死。”[⑤]可见契丹社会还是以契丹语为主要用语。但由于社会的复杂状况，他们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单语者，其间也不乏优秀的双语或

[①] [德] 付海波，[英] 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第36页。

[②] [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281. 后晋天福二年二月胡三省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第1953页。

[③] [元] 脱脱.《辽史·耶律学古传》：卷83.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1303页。

[④] [宋] 薛居正.《旧五代史·契丹传》：卷137. 北京：中华书局. 1976. 第1831页。

[⑤]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898页。

多语人存在。3、多民族杂居区的契丹人为了与其他民族交流则主要使用汉语，杂居区有汉、契丹、女真、回鹘、渤海等民族，语言接触现象、相互借用频繁，人们多是双语或多语人，由于汉文化在当时属于先进文化，所以汉语应该是当地的通用语。有一则史料可证，金国黄龙府为契丹东寨，“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①]

二、汉—契丹型，即母语是汉语但能熟练掌握和运用契丹语者。按人物身份不同也可再细分如下：1、在辽地做官的汉人或别的民族的人对契丹语的掌握情况也各不相同。如玉田韩氏就是一个彻底融入契丹人社会并且是最典型的契丹化了的汉人家庭，韩氏的著名人物有韩知古、韩德让等，他们一方面会汉语另一方面又精通契丹语。《契丹国志》上说：“燕人韩延徽有智、略，颇知属文与语。”[②]；此外还有上文提到的通事，通事一般是懂得契丹语的汉人，职责除翻译外还管理汉人，可见通事还不是普通的翻译人员，《资治通鉴》上提到太宗耶律德光与汉臣张砺的一段对话时，就有通事高彦英在场，太宗责备张砺为何逃归汉地，张砺提出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和心情上痛苦，太宗便回头责问高彦英说道：“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先知，安可复得邪。”[③]可以看出，通事在契丹朝廷上实际掌握重权。还有一位通事新洲（今河北省涿鹿县）人耿崇美，“善骑射，聪敏绝伦，晓北方语。当李唐末，会我圣元皇帝（即辽太祖）肇国辽东，破上谷，乃归于我，初授国通事”。[④]可见，在辽地做翻译官的人并不算少，而且精通两种或多种语言；但也有例外，如上文提到的汉官张砺，张砺所言表明一部分在契丹为官的汉人始终对契丹语无法习惯，也可见契丹境内尤其是官僚中说汉语的人还是较少，大多说的是契丹语，否则不会使张砺感到“生不如死”，无法交流的痛苦。2、各国出使辽地的使者及各国往辽地经商之人也会自觉学习契丹语，他们由于出使的任务或是职业的关系必须要求对第二语言有所掌握，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语言群体。《契丹国志》中记载了不少北宋官吏出使辽国所作的契丹诗，如辽兴宗时宋尚书余靖诗云：“夜筵设罢（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稚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天极也)。”[⑤]这首诗受到了契丹人的喜爱，以后余靖多次出使颇受欢迎。此外，由于宋辽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两国政府为了保守各自的机密，根本不许书籍出境，于是私贩应运而生，往辽地运汉书获利很高，今天发现了许多辽文的汉书就是明证，加之两国正常的商贸往来，商人应该不少，这些商人应该都具有不错的外语水平。3、辽朝境内的汉人聚居区，因为契丹实行“胡”汉分治，被辽朝统治的汉民也有自己的聚居地，他们有些会说契丹语，但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自己的母语——汉语，曾出使过辽地的苏辙有诗云：“燕疆不过古

---

① [宋]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20. 文渊阁四库本。

②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 1. 扫叶山房校刊. 第 1 页。

③ [宋]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8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第 1953 页。

④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耿延毅墓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第 195 页。

⑤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王沂公行程录》：卷 24. 扫叶山房校刊本. 第 5 页。

北阙，连山渐少多平田。……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①]

第四节　契丹境内语言情况的地理分布

一、契丹境内民族、地理分布

历史上的语言分布大致与民族分布相一致。所以语言一般以民族命名，如汉族所说语言为汉语。由于语言是民族的特征之一，因而语言界限一般受民族界限的制约。在多数情况下，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是一致的，即同一民族使用统一的语言，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语言。语言界限和民族界限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所谓不一致，是指一个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或不同的民族使用相同的语言。

生活于辽代契丹境内的人有可能接触到的民族和语言

1、其他民族：奚（奚语）、室韦（室韦语）、渤海（汉语）

2、国内其他民族所建政权：宋（汉语）、金（女真语）、西夏（党项语）、大理（白语）、回鹘（回鹘语）、吐蕃（藏语）

3、国外民族：新罗（朝鲜语）、高丽（朝鲜语）、日本（日本语）

再来看一下这些民族的地理方位：

曾出使过辽国的余靖提到：“（契丹）东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据其窟穴。”[②]曾出使辽地的许亢宗在其行程录上言：“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贞、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鹘、党项，西南有奚。”[③]

辽代的疆域辽阔，“其都有五京自太原以东至高丽有中国之地带数千里。”[④]

在辽的统辖之内，有各种不同的成分：

1、长城南北，主要从事农业的汉人和通解汉语的部分渤海人及奚、契丹，包括燕云州县及若干的头下州城；

2、草原地带，以游牧为主兼营农、猎的契丹人，包括奚契丹、室韦以及其他和契丹使用同一语言的部落；

3、东部兼营耕、牧、射猎的女真人，包括使用通古斯语言的各部落和村寨；

4、西北方面，以游牧或射猎为主的一些部落，包括使用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们，如属于突厥语系的隗衍突厥部，奥衍突厥部和回鹘的薛特部，使用唐古忒（藏）

[①] [宋] 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出山》.《栾城集》.文渊阁四库本。
[②] [宋] 余靖.《契丹官仪》.《武溪集》：卷 18.文渊阁四库本。
[③] [宋]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 40.《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第 32 程.文渊阁四库本。
[④] [明] 杨循吉.《辽小史》.辽海书社印行.第 1 页。

语的党项部……以及其他等部。[①]

由上可知，缘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商品经济欠发达、信息不畅通，语言的分布受制于民族的分布。所以民族、地理的分布，基本上也划定了语言的分布状况。

二、契丹境内语言区域划分

辽代契丹境内主要生活着契丹以及被契丹统治者掠夺来的汉人，所以境内的基本语言是契丹语和汉语。由于交往的关系，也有少数人懂得其他民族的语言。契丹语和汉语是辽朝境内人们主要使用的两种语言，契丹语主要为契丹人使用，汉语是族际间的通用语，这与经济、文化水平的高下直接相关。契丹境内语言使用的地理分布按人口的居住地来划分是：1、契丹语单语区，即辽朝北部（上京道），是契丹人传统的聚居地，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2、汉语单语区，即辽朝南部（南京道、西京道），分布着广大的汉人，在今北京市西南和今山西大同。3、其他民族语言单语区。有居住在国家的北部和南部之间（中京道）的奚人，他们生活的区域是在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奚人有自己的语言，但由于与契丹语接近，语言可以相通。4、双语或多语区。如东部（东京道）的主要居民是被契丹征服的渤海人，其汉文化修养较高，使用的文字是汉字，因此会懂汉语，加之渤海人成分是以靺鞨人为主，兼有高丽遗民、汉人、突厥人、契丹人和室韦人，所以是各种语言混杂其间，这一地区是今辽宁辽阳。此外，对于契丹政权境外的语言状况虽不是本文的拟题范围，但也略作补充：一是辽国北方广袤的疆域内还分布着女真、室韦、阻卜等许多民族，它们各有自己民族的语言，但也有兼用其他民族语言的情况；二是据史料记载，辽代圣宗朝统和十三年（995年）“高丽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契丹语）”、十四年（996年）“高丽复遣童子十人来学本国语”。[②]其次，契丹语的使用贯穿于两辽王朝，后来的金、元王朝仍有人会契丹语，且至西辽为蒙古所灭，还有人使用过。可见契丹语在当时还颇有影响，各个国家、民族都有人懂契丹语。

第五节 辽代语言政策的变化及评价

辽代在语言上，虽然从最高决策者到普通的契丹人民都极力保持着本民族的语言，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虽然精通汉语，但从不用汉语和部族的人对话，如此上行下效，契丹族内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民族语言。然而，随着契丹民族的壮大，掠夺的土地和人口的增加，社会制度从部落联盟的形式到奴隶制、封建制的过渡以及国家政权的建立，对多民族人民的管理工作，尤其是对人口占多数的汉人的征服与治理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政府早期推行的坚守契丹语的政策既不能满足且开始阻碍民族间的正常交往，甚至影响到契丹政权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现状与既定政策的矛盾日益加深，如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汉官、译员应运而生，

---

①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第160—161页。

② [元] 脱脱.《辽史·圣宗纪四》：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47页。

将汉人吸纳到辽政权的统治阶级中，帮助最高统治者（契丹人）管理新的国家、应对多语状况。这一举措标志着国家的语言政策有所缓和和松动，现实的例子就是，辽朝历代皇帝凡略有作为或稍有才智者都精通契丹、汉两种语言，表明从最高统治者开始已经越来越感到汉语的重要作用及其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意义；此外，契丹语的词汇中也吸纳了许多汉语以及其他民族语言中的词语，相互之间产生了大量的借词，这一时期也是各民族语言大面积接触和碰撞的黄金阶段。所以，契丹语消亡的命运在历史上就注定了，同时契丹民族为记录自己的语言而创立的契丹文字的命运就更不容乐观。

第三章 辽代契丹境内文字使用情况

第一节 契丹文字的创制

表 2：契丹文字大事记

编号	时间	事项	史料出处
1		契丹本无文记，唯刻木为信。 有君长部号而无世族、文字记别。	《五代会要》卷 29，第 349 页。 《新五代史》卷 72，第 885 页。
2		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 汉人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蕃书。	《新五代史》卷 72，第 888 页。 《五代会要》卷 29，页 349。
3	神册五年（920）春正月乙丑	始制契丹大字。	《辽史》卷 2，中华书局校点本 1974 年版，第 16 页。
3	神册五年（920）九月壬寅	大字成，诏颁行之。	同上
4	天赞年间（922—926 年）	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明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辽史》卷 64，第 696 页。
5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	诏曰："自今女直（真）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	《金史》卷 9，第 218 页。
6	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十二月	诏罢契丹字。	《金史》卷 9，第 220 页。

一、契丹文字创制的背景及意义

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根据汉字创造了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政权。之前，在

公元七世纪初，有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臣通米桑布扎赴天竺学习梵文和佛法，并参照印度文字设计了藏文，成为吐蕃王朝的法定文字。所以，契丹虽然不是第一个创造并拥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政权，但却是第一个仿效汉字创制了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汉化程度可见一斑。契丹人创制的契丹文字，在我国长城以北的民族文字史上居于鼻祖地位。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田村造实在他的《契丹文字的创制》一文中说："契丹文字成为西夏、女真、八思巴等文字出现的先驱。"[①]契丹文是辽代为记录契丹语而创制的文字，契丹文字的创制不仅在契丹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以后西夏文字和女真文字的创制也有一定影响，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一般的说法，认为契丹人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在十四世纪初建立辽王朝之后，为了适应其国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加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统治地位，创制了契丹文字。

二、契丹大字的创制

契丹在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前，"本无文记，唯刻木为信"，[②]由于阿保机与汉人交好，"汉人教以隶书之半增损之，制契丹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③]，这些字可能就是契丹大字的雏形或早期形式。阿保机建国后，命耶律鲁不古和耶律突吕不创制正式的契丹文字，根据史料推测，阿保机本人也为这项工作做出了不少贡献，"神册五年（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④]

大字是增减汉字笔划而成的，大多是词符字，以几个音符叠成契丹语的一个音缀，在形体上仍仿汉字合成一个方块字，同汉字一样是表意文字，但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表意文字，契丹大字以汉字变体字为主要书写符号。如"天"下加一"土"即表示天，书写为""；"大"字上加一横两点即表示大，书写为""；有的契丹字则完全借用汉字，如皇帝、太王、太后、日、月。[⑤]在全部仿汉字而创制的少数民族文字中，契丹大字是问世年代最早的一种，从同类的民族文字估计，大约"音读"和"训读"两种方式在其中都不会少见。

此外，按照常理，辽王朝为了推行这种新创制的文字，大约编过有关字典和入门读物，但今天没有发现有契丹文教材，只有汉文教材《蒙求》一书。大字刚行用不久人们就感觉这个系统的字数太多，且笔画比较复杂，学习起来不太方便，实行的效果似乎不太理想。

三、契丹小字的创制

天赞年间，"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明可使。'

---

① [日] 田村造实.《契丹文字的创制》.《东洋文化史大系》：诚文堂新光社版，1938。

② [宋] 王溥.《五代会要》：卷29. 北京：中华书局，1998. 第349页。

③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卷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888页。刻木之约，原始记事的一种方法。常用在木片、竹片或骨片上刻痕的方法来记录数字、事件或传递信息，统称为刻木记事。

④ [元] 脱脱.《辽史·太祖本纪二》：卷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16页。

⑤ 贾敬颜.《契丹文》.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第85页。

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①]

小字又被称为“小简字”，与大字相比是以少量的符号表达完备的内容，是受到回鹘语文的启示、在改进大字和利用大字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是表音文字，但从笔划和字体上看显然也受到汉字的影响，采用的仍旧是汉字笔画，并没有因为它的表音形式而采用回鹘字笔画。

《中国通史》评价说：契丹小字大约是以一个方块字代表一个音缀，但不再象大字那样合叠成多音符的方块字，而是参照古回鹘文的办法，自上而下连续直写。……但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节词之间又不易截断的缺点，行用起来很不方便。[②]

张振中在其文《契丹天书》中说道：“契丹小字的行文系自上而下竖写，自右而左换行；敬词抬头或空格。叠词中的后一个字有以上下重叠的两点表示同前一个字的。契丹小字也有篆体、正楷、行草等书体之别，这些又与汉字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③]

清格尔泰等编著的《契丹小字研究》认为契丹小字是在汉语反切知识的启发下，利用汉字笔画形体创造出来的一种介乎音节和音素之间的拼音文字。共有378个原字，有的表音节，有的表音素，书写时往往是按左右上下的次序堆砌起来才能表示一个词。这样虽然也很麻烦，但从准确记录语言的角度看，小字的确比大字要优胜一些。契丹语的一个词大多由两个至七个原字拼合写成，拼写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的顺序叠写，六种组合方式：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①②
③ ③④ ③④ ③④ ③④
⑤ ⑤⑥ ⑤⑥
⑦[④]

由上可知，契丹小字的创制对整个文字体系进行了大幅度简化，小字在发生学上属汉字系统，类型学上则是音符文字。变异型的汉字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形体的变异，摆脱了汉字原有音义的影响，反过来又促进了汉字的发展。

小字制成之后，契丹国内推行的是“一语双文”的政策，也就是说，原有的大字并未因此而被废止，但从现有的资料估计，契丹小字的流行情况要好于大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四、契丹文字的创制方法及举例

契丹字利用汉字的方法主要有三：

1、增损汉字笔画：

契丹大字：（兄）、（奈）、（刊）、（女）

契丹小字：（几）、（伞）、（夹）

---

① [元] 脱脱. 《辽史·皇子表》：卷64.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968—969页。

② 蔡美彪. 《中国通史》：第六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第124页。

③ 张振中. 《“契丹天书”何时揭开你的红盖头》. 上海档案。

④ 聂鸿音. 《中国文字概略》.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第194页。

2、笔画改形：

契丹大字：（未）、（充）、（土）、（尼）

契丹小字：（一）、（二）、（九）、（有）

3、借用汉字的古体、俗体、异体或楷书之外的某一书写体。借用此类汉字也可和通用汉字相区别。

契丹小字：（从益省）、力（从加省）、（从屠省）[①]

表 3：契丹字举例

汉字	契丹大字	契丹小字	说明
天（天地的“天”）			
天（日子的“天”）	日		
二	二	圣	
五	五		
月	月	艾	小字的“月”同回鹘文。
年			

（根据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94 页。）

第二节 契丹文字的使用范围

一、契丹文字在时间上的使用范围：

契丹字创制之前，辽境内通行的应该是汉字；契丹大、小字颁行以后，两种契丹字与汉字同时使用。契丹字创制之后被辽朝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辽亡后，西辽继续使用，金朝初年仍旧使用，诏用到金中叶，而且金的国史院曾经专写契丹字。金灭辽亡后，契丹文仍被允许使用了五十三年之久。契丹文从颁于辽太祖神策五年到废止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四月，共行用了二百七十一年。

《金史·熙宗本纪》记载：“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颁女直小字。……（九月）乙未，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渤海同汉人。”[②]大定年间，译汉字经书时契丹字还作为媒介。金世宗：“契丹文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当时何不立契丹进士科。”[③]《金史·完颜希尹传》：“金人初无文字，国势日强，与领国交好乃用契丹字。”[④]在我们今天考古发现的契丹文字资料中就有三件是金初的。如：在著名的武则天陵墓前“无字碑”上刊刻的契丹字、汉字

---

① 张公瑾，王峰.《汉自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 赵丽明，黄国营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 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第 213－216 页。

② ［元］脱脱.《金史·熙宗本纪》：卷 4. 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 72－73 页。

③ ［元］脱脱.《金史·选举制》：卷 51. 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 1141 页。

④ ［元］脱脱.《金史·完颜希尹传》：卷 73. 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 1684 页。

合璧《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刻于金太宗天会十二年（1134年）；还有河北省兴隆县出土的《萧仲恭墓志》刻于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二年（1150年）；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金代博州防御使墓志》刻于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①]

元太宗窝阔台执政期间（公元1225—1264年），南宋理宗朝的彭大雅和徐霆二人，曾经出使蒙古，根据二人所撰疏而成的《黑鞑事略》言："契丹、女真诸亡国者只用汉字……契丹、女真元自有字皆不用。"[②]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收有《醉义歌》一首，自序说是"辽朝寺公大师"所作，原作为契丹字，楚材在西域遇到西辽前郡王李世昌，学习契丹字，乃作此歌。[③]

契丹小字尚未普及到民众之中，但在部分契丹人内部，并未间断对其祖先创制的契丹小字的识用。然而有资料表明，即使是在元代以后，契丹小字也未在契丹遗民手中彻底绝迹。[④]明代云南契丹人墓碑上共发现十二个契丹小字。从其出现的时间看，最晚的在天启元年（公元一六二一年）。清代云南契丹人墓碑上共发现八个契丹小字，所刻时间最晚的在道光葵卯年（公元一八四三年）。在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统率之下，在奉调参加出征云南的契丹军将领和文职人员中，仍有一些能够识用本民族文字的人，而且世代相传，直到清代道光年间。[⑤]

较为肯定的结论，从现存史料看，至少到了明代，世间对契丹文字的面目皆已遗忘，契丹文字已成为一种无人可识的死文字。契丹文字自明、清以降亦不为人所知晓，以致明、清一些大学问家如赵崡、钱大昕、王昶等，在他们所编著的《石墨镌华》、《潜研堂金石跋尾》、《金石萃编》中，都将刻于金代的《郎君行记》误指为女真字，而言"一字不能辨"[⑥]。

可见，契丹文的行用在金代开始由盛而衰，元代仍有少数人使用契丹文字，明代只剩一点遗迹，清代基本上无人能识。

二、 契丹文字在形式上的使用范围：

契丹字主要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以及书写乡里之名和写诗译书等项，同时也用于翻译佛经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这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现在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哀册、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盏、玉盘、银匙、鱼符、印章、银币、铜币以及匕首等生活用品的边款铭文等。此外，根据各种史书记载和实物发现，小字在当时辽国境内，除了使用于碑刻、墓志、符牌、军旗、写诗、译书等方面以外，还曾行用于外交书函、公文、科举、历史纪录、文献翻译和记录所辖的诸部乡里之名。

下面分项举例说明：

1、哀册：如1930年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县西北的辽庆陵出土的辽道宗生平事迹的哀册石刻，就是用汉、契丹文对照刻写的。

---

①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第260—261页。
② [宋] 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③ 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37页。
④ 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04期。
⑤ 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71—172页。
⑥ [明] 赵崡.《石墨镌华·金都统经略郎君行记》:卷6.文渊阁四库本。

2、墓志：1951年辽宁锦西西孤山辽墓中出土的大安五年（1089年）辽静江节度使《肖孝忠墓志》，刻有另一种形式的契丹文字，与哀册文迥异，两种契丹文一种为大字，一种为小字无疑。此外，契丹小字《耶律仁先墓志》是迄今发现的契丹小字文献中字数最多的一件。

3、碑刻：文献中有记载："天赞三年（924年）九月甲子，诏砻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①]这里是为了记录阿保机西征回鹘的功绩，所用应该是契丹大字。

4、牌符：《辽史拾遗》中记载：燕北录曰银牌有十三道，上是番书朕字；长牌七十二道，上是罚番书敕走马字；又木刻子牌一十二道，上是番书急字，左面刻作七刻取本国历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是番书永字。[②]

5、残石及器皿等：巴林左旗辽太祖陵及内蒙地区出土的残石和铜、银器上都刻有契丹文。1956年出土了辽代银匕一件，柄背刻有九个契丹字。[③]

6、书函：928年，后唐大臣王晏球"又获契丹绢书二封来进，明宗（李嗣源）命宣示群臣，莫有识其文字者。"[④]按时间看，也应该是契丹大字，证明大字创制之初就被用于书函信件。

7、乡里之名：耶律庶箴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

8、教育、翻译等文化事业：目前发现的契丹文译著有《旧五代史》、萧韩家奴翻译的《通历》和《贞观政要》以及圣宗翻译的白居易的诗集等。历史上曾记载用契丹字翻译的著作还有《律书》、《阴符经》、《方脉书》、《辨鴳录》等。

9、诗歌：今天见到的辽代诗歌都是用汉文创作的，而用契丹文写的诗一首也没有。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曾写过一首题为《东丹骑射》的绝句，赞美辽东丹王画的"骑射图"，开头一句便说"意气曾看小字诗"，这显然证明画上题有东丹王用契丹小字写的诗歌。关于诗歌，后文有专节论述。

由上面所列的契丹文使用的范围看，统治者对契丹文的推广已经竭尽全力，从官方的文案到日常的生活用具都使用着契丹字，然而实际它的使用又显出了狭隘的一面，文书只有官吏在用，而金银铜器等也只有贵族才可享用，所以，契丹文最多只是官僚贵族之间的一种交际工具，而没有用于百姓。

三、契丹文字在人员上的使用范围：

首先，由于辽的时代、社会背景及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能够掌握文字的大多数是官方，在民间则多为贵族等级中的知识分子，普通百姓极少有受教育的权利，对文字的掌握有限；其次，契丹本是游牧民族，也没有文字，人民仍旧保持骑射的传统，皇室、贵族中也有许多人只重武功不习文学，所以能用文字的大多数应为契丹族中汉文化修养较高的人；再次，在契丹为官的汉族文官及其他民族的官员，由于其本民族的传统限制，对契丹文的学习和使用也应该十分有限。

---

① [元] 脱脱.《辽史·太祖本纪上》：卷64.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0页。
② [清] 厉鹗.《辽史拾遗》.广雅丛书本，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第28页。
③ 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159页。
④ [宋] 王溥.《五代会要》：卷29.北京：中华书局，1998.第349页。

所以，能够应用契丹文的人群就主要集中于契丹本族的上层知识分子的范围。契丹大字的创立者耶律阿保机、耶律鲁不古、耶律突吕不和契丹小字的创立者耶律迭剌，加上上章表 2 提到的耶律大石等八人，以及曾提到过的因“通契丹语，识小简字（契丹小字）”就称“博学世俗事”的郑恪；此外还有辽国的君主，比如说辽圣宗，曾亲自用契丹大字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在朝内群臣间传诵；再比如说辽兴宗就坚持阅读由萧韩家奴用契丹文翻译过来的《贞观政要》，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兴宗汉文化水平较低，而契丹文水平较高；一是兴宗汉文水平其实不错但为了推广契丹文在以身作责，兴宗时距颁行契丹字已历五代，无论两种情况，说明国家对于民族文字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据史料记载，兴宗汉文水平较高，那么第二种可能性较大，历五世还需要皇帝身体力行地来推行，那么契丹文确实推行艰难。综上所述，史书中有明确记载懂得契丹文字的只有十几个人，可见契丹文的使用十分有限，在当时可以说还是一种专门学问，还没有被一般人所能普遍掌握，否则不会作为一项文学才能被记录在案，所以契丹字虽由国家强令颁行，却并未普及开来。而且，至今未发现有契丹文书卷存世。

第三节 其他民族文字在契丹境内的使用情况

与契丹文尴尬局面相反的是汉文在辽境中的使用情况，辽境中大批的汉人尚不必说，辽的属国东丹国（原为渤海人的国家，被契丹征服）中的渤海人使用的也都是汉文，汉文的巨大魅力还影响着很多契丹人。从皇帝开始就对汉文典籍十分喜爱，《古今诗话》云：“辽人好乐天诗，闻辽主有诗云：‘乐天诗集是吾师’。”[①]辽朝从中原输入了许多汉文书，出使过辽国的使臣归宋后上书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②]

一、外交上，辽朝对外的正式公文，朝廷的诏令奏议，对中原的一切国书，对地方上南北边郡的文牒，对西夏的所有文件，都是一律用的汉文。[③]《宋史》载：“国家与契丹常有往来书。”[④]

二、教育上，教育方面，契丹设有学校，所习多为汉文典籍，《辽史拾遗》中说：“道宗清宓五年诏养学士颁五经及传疏。”[⑤]因为目前发现的契丹文译著还没有儒家经典，所以学校的课本为汉文的可能性较大，至少可以认为学校教授汉字比契丹字的可能性较大。考古发现在辽代木塔中存有的《蒙求》一书就是教学课本。此外，辽朝也翻刻了一些汉文名著，经朝廷下诏颁行的有《史记》、《汉书》等，民间翻刻的更多。但统治者为了文化统制的需要曾一度禁止民间刻印文字，

---

①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长沙：岳麓书社，1992.第 6 页。
② [宋] 苏辙.《栾城集》:卷 42.文渊阁四库本。
③ 杨树森.《辽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第 291－292 页。
④ [元] 脱脱.《宋史·礼志》：卷 110.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 2641 页。
⑤ [清] 厉鹗.《辽史拾遗》.广雅丛书本，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第 12 页。

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禁民私刊印文字。”[①]

三、科举取士方面，政府规定只有汉人、渤海人可以参加科举，契丹人不许科考，所以科场考试程文包括科举试题和答题所用文字应该是用汉文，《契丹国志》说：“（契丹科举）程文分两科曰诗赋曰经义。”[②]有一则史料：重熙中，季父房耶律蒲鲁应试及第，为有司告发，其父耶律庶箴以“擅令子就科目”[③]，被处以鞭刑二百。可见，有些契丹族贵族知识分子对汉文的掌握十分熟练，以达到同汉人同场应试而中举的程度。

四、翻译方面，关于佛经的翻译、解释、著作全用汉文。

五、撰写史书上，如991年室昉、邢抱朴等撰实录二十卷；兴宗时，萧韩家奴与耶律庶成等编录遥辇可汗以来至兴宗重熙时事迹，共二十卷；其中室昉、邢抱朴、耶律俨（本姓李）都是汉人，而身为契丹人的萧韩家奴和耶律庶成却是精通汉字的；而且今天流传下来的《辽史》等史籍又是元以后人根据实录等编撰而成的，元代能认识契丹字的鲜有其人，所以大致可以判断当时所编著的史书多数是用汉文书写的。

六、文化研究与交流上，一般士人研习的经书都用汉文，甚至连契丹文学家的诗文集，大多都是用汉文写的。郭沫若在其《〈侈靡篇〉的研究》的脚注中提到“可能是辽人的刘绩，曾为《管子补注》。”[④]后有闻一多、许维遹又论证了“补注《管子》者当即辽人刘绩。”[⑤]刘绩是契丹人，因为“耶律”的半音与“刘”谐音，或有认为“（辽）太祖慕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⑥]姓“刘”其实就是姓“耶律”。可知，契丹人已经可以用汉文撰写经类的图书，可见汉字传播之深入。还有使辽的使臣，听说辽国燕京书肆自己刻印苏轼的诗，叫做《大苏集》。

七、哀册、墓志、碑文等项，除用契丹字外，也有用汉字的，或是契丹和汉字并用的较多。如《耶律羽之墓志》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辽代汉文墓志中年代最早、墓主人地位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墓志。其志文——《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也是辽早期墓志中内容最丰富的一篇杰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志文中关于契丹耶律氏族源、辽代职官制度、契丹与中原王朝关系的记载，对墓主人生平评价及其文字应用等方面，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同时还具有文学艺术价值、文字学价值和政治价值。

八、商业上，由于契丹与汉族地区长期以来都有商贸往来，尤其是澶渊之盟以后的一百多年，两国设有法定的互市，因此按照惯例，商贸上的文书等基本使用的是汉文。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有些场合下是契丹、汉字或者还包括其他民族的文

---

① [元] 脱脱.《辽史·道宗纪二》：卷22.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264页。
②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试士科举》.扫叶山房校刊.第5页。
③ [元] 脱脱.《辽史·耶律庶成》附传：卷89.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351页。
④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第148页。
⑤ 闻一多.《管子集校·叙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第3页。
⑥ [元] 脱脱.《辽史·后妃传》：卷71.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19页8。

字共同使用的，如刻碑就有“天赞三年九月甲子，诏砻闢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字纪其功。”[①]还有哀册墓志之类，有用契丹文的，但多为汉、契丹两种文字对照刻写，即使专用契丹字，也必须用汉文题额，纯用契丹字不用汉字是个别的。总之，可以说汉文在辽代仍是一种通用文字，其通行面事实上是驾乎契丹文的。

第四节 契丹境内文字的走向与消亡

综观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史，我们可以把文字政策的动因归纳为三种，即宗教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语言的因素。[②]契丹文的创制是为了记录契丹语，同时是为了契丹政权的政治服务的。但是形如汉字的契丹字在产生之初就与身为阿尔泰语系的契丹语表现得很不协调，周边的环境也决定了使用汉字较之契丹字更便于内政和外交的进步。因此，契丹文字的使用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契丹文字在辽朝使用范围本来就不甚广泛；加之辽代的书禁政策，民间常常不准私自刊书；还有连绵不断的内战和外部征战，致使残存的资料十分有限。只有上文曾提到过的宋人王易《燕北录》所载“朕、敕、走、马、急”五个契丹字，元陶宗仪又在《书史会要》中转写了相对应的这五个字：“、、、、”。契丹文在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 年）四月被正式废止使用，诏曰：“自今女直（真）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③]十二月，“诏罢契丹字”[④]。此后便鲜有所闻。今天，契丹字已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古文字和死文字。契丹字的命运为何如此暂瞬即逝，是有着诸多方面原因的，前辈学者均有深刻论述，所以本文仅从文字本身的发展规律及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角度出发，做一点浅显的探讨。

一、从文字本身发展的规律看：随着国家机构的发展完善、社会文化层次的提高以及文化传播范围的扩展，必然要求文字的引入。契丹社会的初期，很自然地借用了汉字，然而随着自身民族意识的发展，民族自尊的情结使从统治阶级开始，尤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法忍受对汉字的完全借用，于是根据汉字创制了本民族的文字并将其视为契丹民族历史上的伟大成就，这就是契丹大字的创制。然而实际应用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再又借鉴回鹘文创制了契丹小字，但仍无法摆脱汉字的束缚和影响。也许是历史和契丹人开了个玩笑，没有让契丹民族遭遇一种合适拼写契丹语的字母体系，也未遇到一种适合借鉴的拼音文字。契丹文的命运同样影响到了后来的金和西夏，女真、党项族的统治者们看到的是契丹文字的短期成功和政治影响，于是纷纷效仿，然而时代和地域甚或还有机遇的局限也没能让它们走出汉字的影响范围，通过对汉字模仿而创造的民族文字，不仅在当时当地就存在使用上的困难，此类文字的生命也没能在历史上存在多久，甚

---

① [元] 脱脱.《辽史·太祖本纪上》：卷 1.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20 页。
②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第 213 页。
③ [元] 脱脱.《金史·章宗本纪》：卷 9. 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 218 页。
④ [元] 脱脱.《金史·章宗本纪》：卷 9. 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 220 页。

至到今天，人们还要为在某件古物、古书或某一古迹上发现的一种文字究竟是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女真大字、女真小字或是西夏文而争论不休。于是契丹文不仅在当时就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似乎只成为了墓碑、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钱币上的装饰文，随着契丹王朝的覆灭，它的文字不久也沦为一种死文字。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再次产生了一次历史的遗憾。

二、从与汉文字的关系看：文字的本质是一种文化现象。虽然不一定是每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文字，但文字的产生标示着社会的进步，是民族文化发达的一种表现形式；文字的产生与行用反过来又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发展。契丹民族创制文字的意义还在于它首开我国北方民族建立政权后利用政权力量创制本民族文字的先河，它象征着我国北方民族发展到中世纪时的一种新的追求与新的景象。[①]

文字体系可以反映出相邻民族在文化上的影响，这是公认的道理，而就其文化潮流的具体动向来说，则大都是政治力量比较强大的、生产方式比较先进的民族影响那些相对落后的民族。在这一方面，契丹文的创制是很好的例子。契丹语无论是在类型学上还是在发生学上都与汉语相去甚远，而与相邻的回鹘语较为接近，由此人们自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汉字和回鹘字同时对契丹民族产生影响为什么，二者的文字学性质迥然不同，不像后世的蒙古人那样，采用现成的回鹘文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却偏偏改制了既难认又难写的汉字呢？……契丹字的创制原则是文字学上的误会，但却是文化史的必然。[②]

汉字型民族文字是在长期借契丹人用汉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汉字是各民族汉字型文字的母体。各民族自行创造新字，也是在这一母体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所谓自造，并非创造新的符号体系，而是先借用某种汉字符号，再加以各种类型的改造和组合，造成新字。[③]对原有汉字进行改造和变异，是民族文化或求异心理的一种反映，改造和变异的目的是为了和原有的汉字相区别，表明这是本民族自造的新字，不再是汉字了。[④]

汉字体系是对汉文字及其在中国和亚洲的约十种后裔文字的总称。产生于中原的汉文字在纪元前就开始传入其他民族居住的地区，并且被用来记录少数民族的语言，但少数民族主动地参照汉字来创制自己本民族文字，则是公元 10 世纪以后的事情，这可以视为唐、宋、元三大王朝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及繁荣的民族文化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汉文字体系中各文种的使用情况很不平衡，其推广程度完全视其是否用为某个政权的官方文字而定：契丹、西夏、女真三种文字推行的较好，是因为借助于辽、夏、金三个王朝的力量。[⑤]

---

①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第 261 页。
②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第 18－19 页。
③ 张公瑾，王峰.《汉字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赵丽明，黄国营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第 210－211 页。
④ 张公瑾，王峰.《汉字型民族文字的造字方法》.赵丽明，黄国营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第 213 页。
⑤ 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第 71－72 页。

三、从语言和文字的相互关系看：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就今天的现状看，大多数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所对应的文字都是以字母为基础的表音文字，契丹文虽然也是表音文字，但它又恰恰是与表意的汉字的关系更加密切，所以，首先在理论上就注定了契丹字的命运。语言、文字一向被视为民族精神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受到统治者，尤其是少数民族统治者的重视，为了民族自尊、加强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以及自身统治的需要，都必然要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以防汉族首先从语言上来消磨契丹民族的特色，语言上的反汉化是最容易被留意到，进而可以采取行动加以阻碍的。契丹民族生存的时代，虽然在军事上不断强大起来，以至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然而与中原的北宋相比，文化上是落后的、人口上属于少数民族，必然是受之的要比施加的影响大得多。鉴于语言、文字在文化上的传播作用，以及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汉语和汉字的配套体系对契丹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必定是深刻的。一方面推动着契丹社会的发展，使之更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甚至很快创制了自己的民族文字；但同时也有负面的作用，文字的发明是为了记录语言，同时克服语言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如果一种文字本身成为不易学习的专门学问，那么它记录语言、传播文化的功能必定大打折扣，语言与文字的不协调势必影响到语言和文字的继续发展。

第四章　辽代契丹境内语用特例及其形式举隅

契丹境内的语言文字在有辽一代发展和成熟，不仅体现在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上，还表现在其他语文形式的应用方面，例如辽人的避讳之风从无到有，契丹人无法用契丹语抒发的情感却可以借助汉文诗歌表现出来，辽代号称严酷的书禁政策究竟是否达成了制定者的心愿等等，本章将列专节具体详述。

第一节 避讳

避讳是中国特有的风俗，宋代避讳之风最盛，而辽与宋基本并立，自然受到影响。现将辽代避讳情况列表如下：

表 4：辽国世系及其避讳情况表

帝号	汉名	契丹名（字，小字）	年号	在位时间	避讳举例
太祖	億	阿保机，啜里只	一（10） 神策（7） 天赞（5） 天显（13）	907－927	宋庆历三年（1043 年）贺国主生辰使丁億，更名意。
太宗	德光	德谨，　尧骨	天显 会同（10） 大同（1）	927－947	改晋天雄军节度范延光为范延广，改光禄大夫为崇禄。
世宗	阮	兀欲	天禄（5）	947－951	
穆宗	璟	述律	应历（19）	951－969	
景宗	贤	贤宁，　明扆	保宁（11） 乾亨（5）	969－982	宋庆历三年贺国母正旦使李维贤，更名宝臣。
圣宗	隆绪	文殊奴	乾亨 统和（30） 开泰（10） 太平（11）	982－1031	
兴宗	宗真	夷不堇，只骨	景福（2）	1031－1055	改女真为女直。

			重熙（24）		
道宗	洪基	涅邻，　查剌	清宁（10） 咸雍（10） 大康（10） 大安（10） 寿昌（7）	1055－1101	宋明道元年（1032年）贺国母生辰使王德基，辽史作王德本。
天祚帝	延禧	延宁，　阿果	乾统（10） 天庆（10） 保大（5）	1101－1125	改兴宗重熙年号为重和，姚景禧改名景行。

（避讳举例引自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7页。）

重熙十三年（1055年），萧韩家奴上疏说："厥后累圣相承，至夷离堇胡烈以下，大号未加，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尤以名呼。"[①]萧韩家奴是契丹的博学之士，列于文学传，但他在上疏给皇帝时对于皇帝先族的名字却不避讳。由表知，兴宗时虽已有避讳之风，可见辽代的避讳要求不太严格，辽的避讳之风并不盛行，或者是契丹人之间尚无需避讳。因为，《廿二史札记·金一人二名》有言："盖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亦各有所当也。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②]辽人也有取汉名的风俗，应该与金的情况相似。

综合可知，辽的避讳之风学自汉人。

首先，从避讳的对象看，避讳制度多用于汉人和女真人，而契丹人自己却不避讳，因为契丹人之间的交流用的是契丹语，契丹语最早是没有文字对应的，契丹原也没有避讳之风，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了解到"避尊者讳"，为了树立自己华夏正统的地位以及君主的权威，也开始要求实行避讳制度，主要针对的就是汉人，要求汉人要像敬畏汉人自己的皇帝一样敬畏契丹人的皇帝，甚至扩展开来，同样要求为其部属的女真人，应该还会要求成为其属国的东丹国的渤海人。

其次，从避讳的内容看，从上表知，需要避讳的都是辽帝的汉名，契丹名是不用避讳的，因为契丹名用于相互之间的称呼之用，且契丹语本也无文字，表上的文字是由译者音译过来的，汉名用在正式的公文之中，只有一些外交公文是需要发往别国的，必须要求别国人避辽国皇帝的讳；此外，最初只要求人名避讳，后要求族名避讳，最后要求曾经用过的年号也要避讳，因为，辽国皇帝的年号均采用的是汉字汉意，可知，辽的避讳之风有深入迹象，这与其建国日久、汉化程

① ［元］脱脱.《辽史·文学传》：卷103.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449页。

②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8.北京：中华书局，1984.第624页。

度益深不无关系。根据史书记载，辽人的避讳见于文字的有避唐讳、宋讳、先祖讳，为唐讳也不是具有普遍性的自讳，而是选择他们尊敬的封建帝王如唐太宗、唐玄宗，即为尊者讳，不仅讳名，也讳庙号。

然而，较之汉族，契丹人的避讳还是非常简单且不太严格的，看不到口语上的强行限制，时间上也可能是时有时无的，需要避讳的项目也不太多，可见其语言文字在应用上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本民族自己的特点，有民族心理和习惯的要求，也有民族极力保持自身特征的努力。但契丹制字以后，因为契丹字用于外交公函，所以那些需要避讳的且有汉字对应的契丹字在书写上应该也是需要避讳的。

第二节 诗歌

辽人好诗，曾经亲自用契丹大字翻译了白居易《讽谏集》的辽圣宗就发出过“乐天诗集是吾师”的感言，而出使辽国回宋的苏辙有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①]辽人自行出版了苏轼的文集，号《大苏集》。可见，辽国从帝王天子到普通百姓都对诗抱有极大的热情，而白居易和苏轼是辽人最喜欢的两位中原诗人。

此外，辽人更爱做诗。最爱做诗的皇帝是圣宗耶律隆绪和道宗耶律洪基，辽朝还有许多女诗人和方外诗人，其中诗作流传下来数量最多的是道宗皇后萧观音，最长的诗是寺公和尚的《醉义歌》。辽境内的诗作可以作如下分类。

一、从作者的民族和使用语言文字的类别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类是契丹汉诗，指的是契丹族诗人用汉语写作的诗。这类诗的作者和作品都十分有限，主要有耶律倍、耶律洪基、宣懿皇后、天祚文妃等几位精通汉文化的契丹上层。契丹人写汉诗，显然是接受和模仿中原汉诗的结果，其中也有用汉语对译契丹语的痕迹，采用的方式也是学习汉诗的规则。因此，这类作品的水平不高， 只有一首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君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被评为是契丹汉诗的压卷之作，其他则平平无奇，所以聂鸿音《辽代诗坛管窥》一文评价说：“契丹人在模仿汉人用汉语作诗时，大多是只能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②]

一类是汉人所作契丹诗，指的是略通契丹语的汉人所作含有契丹语词汇的诗。这类诗的作者多是出使辽地的汉使或是在辽地任职的汉族官吏，这中间也包括渤海等其他民族的使臣和官吏，作品的特点是契丹语与汉语夹杂使用，内容多为应和辽国皇帝意愿的颂诗或是应皇帝要求临时发挥的作品，实是一些应景之作，文学价值也不甚高。如前文提到过的宋尚书余靖的北语诗。又有使臣刁约的北语诗云：“押燕移离毕（官名，如中国的执政），看房贺跋支（如执政防阁），

[①] [宋] 苏辙.《栾城集·伤足》：卷 16. 文渊阁四库本。

[②] 聂鸿音.《塞北三朝》. 北京：中华书局, 2001. 第 49 页。

饯行三匹裂（似小木罂，以木为之，加黄漆），密赐十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穀粱，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①]

一类是契丹人所作契丹诗，又有两种情况，以契丹文字的创制和使用为界，之前多是契丹语的口语诗或者有用汉字记录的契丹语诗，之后开始出现辽字诗，有用契丹大字的，也有用小字的。如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原作是契丹字，后由元人耶律楚材译成汉文流传下来；前文提到金人元好问的绝句《东丹骑射》中有“意气曾看小字诗”一句，证明有东丹王耶律倍用契丹小字所作的诗作存在。但是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有完整的契丹字的诗作存世，也有一些契丹文的墓志中可能含有诗作的可能，但由于没有完全解读，也不得而知。

一类是生活在辽境内，以汉族为主包括其他民族的人民所作的汉诗，作者多为使臣、官吏或是俘虏，史书中有记载的如李瀚、和凝、刘昫等人，这一部分其实是辽朝数量最多的诗作，因为汉人有着悠久的做诗传统，而辽人作诗才刚刚起步。

二、从诗的体裁和韵律来看，辽人完整地学习了汉诗对于格律的要求，表现为诗作种类的齐全。《金史·选举志》记载：“契丹书写，以熟于契丹大小字，以汉字书史译成契丹字三百字以上，诗一首，或五言七言四韵，以契丹字出题。”[②]可见，契丹字的诗歌也象汉文旧体诗那样，分为五言和七言两类，只是其格律诗特征还不得知。

按照黄震云《论辽代诗》的划分，辽境内存在过的诗体如下：

1、五言绝句，如萧观音的《十香词》共有十首，皆以香字落尾，用同一韵，收录在辽末王鼎撰写的《焚椒录》中，是一组契丹汉诗。

2、五言律诗，主要是辽地汉人的作品，有和凝的《题鹰猎兔画》等，未见有契丹人所作的五言律诗存世。

3、七言绝句，如萧观音的《怀古》云：“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水平已经较高。

4、七言律诗，如辽阳寿昌五年天庆寺勒石记有二十五首。

5、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如耶律倍的五言：“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 还有上文提到的道宗的《题李俨黄菊赋》是有名的七言古诗。

6、口号，是一种即兴的表达，可以吟诵而不必入乐的诗歌体裁。

7、骚体，如萧观音的《绝命辞》二十四句。

8、咒语诗，一般是道士所作的青词，只有一例，《朝鲜文学史》上提到的《心火绕塔》。

9、回文诗，《辽史》中提到的才女耶律常哥有作回文诗。

10、杂言诗，有四言、六言、八言的对句，还有一些接近诗体的谚语和歇后

[①] [宋]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 24：扫叶山房校刊。

[②] [元] 脱脱.《金史·选举制》：卷 53. 北京：中华书局，1975. 第 1182 页。

语。[①]

辽诗以七绝和七律最为盛行，契丹族作者喜欢不拘于格律的五古和七古，五言律诗主要是汉人的作品，五言绝句和其他类型的诗歌流传下来的较少，很多只是孤证，可见并不流行。辽代还曾创合璧诗体裁，为元曲中掺用民族语言开创了先例。

此外，从辽代诗文的押韵系统来看，辽人口中的韵母与中古汉语有三方面的不同，即部分中古双元音有单元音化的趋势，中古的三个塞音韵尾已经失落，中古的三个鼻音韵尾像现代山西话那样重新组合为－n和－ŋ。[②]

三、从诗的内容和功用看，则表现出较为单一的性质。辽的诗人主要是贵族和僧侣，他们极少去体察契丹人民的思想感情，只把视野局限于宫廷和寺庙等狭小的空间中。因此，契丹人的诗一类是政治性的讽谏诗和颂诗，又有描写宫廷生活、抒发个人情感的田园、怀古、抒怀等类型的作品；一类是描写寺院生活和阐述佛理的宗教诗篇。与此相应，契丹诗的功能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为政治服务，如以诗取士，诗赋一直是契丹科举的重要内容；此外由于契丹君主爱诗，常常赐诗来褒奖臣子，又常令臣子和诗，并以诗作的高下来选拔人才和品评人物。

总之，辽代诗歌作为辽文学、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漠北民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唐、宋诗歌的营养，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诗歌风气。

第三节 散文

诗歌之外，辽代的文坛还留下种类繁复的散文作品。陈述《全辽文》13卷、45万字，加上3篇附录、不过60万字，分别为类目索引、作者索引及事迹考、图版（出土的辽代契丹语志石、哀册、记等18则）。类目索引分为诗、谣谚、诏谕、敕制、哀册、册、官告、表奏疏、碑铭、颂、偈、记、塔记、幢记、题记、祭文、墓志、杂著等27类。黄震云在《论辽代散文》一文中认为，《全辽文》可分为35类，因为诗和谚（包括青词等）在文的范畴之外，而敕文、判文（法律文书）、契约、铭文（包括砖石等金石文字）应单独列项，不易以杂著二字相概；辽代的实录又分为帝王实录和相当于碑记一类的如实记录事物性质的纪实文字两种；辽代尚有赋和小说。[③]此外，向南《辽代石刻文存》55.5万字，在《全辽文》基础上增加了少量石刻文字。辽代散文的特点如下：

首先，从版本类型来看，以金石文字为主，没有完整的作家文集。如哀册、碑铭、墓志等，现在看来，辽文流传于世的主要是金石作品，文本极少，虽然《辽史》等史书中记录了许多作家作品的名目，如辽道宗的《清宁集》、《御制诗赋》、耶律隆先的《阆苑集》、萧柳的《岁寒集》、耶律良的《庆会集》等，但往往是有

---

① 黄震云.《论辽代诗》.《文学评论》，1994，01期:第32－34页。
② 聂鸿音.《辽代诗文用韵考》.《满语研究》,1999,02期。
③ 黄震云.《论辽代散文》.《社会科学战线》，2001，05期：第123页。

名无实，只有上文提到的几首诗作流传下来，其他都是只言片语，大多是只留下了一个集子的名字而已。

其次，从作者类型来看，能够写作的阶层比较单一。多为帝王将相以及后妃等贵族阶层，包括生活于辽境的许多汉臣，平民百姓的作品几乎没有，只有一些佛教人士，如和尚尼姑所写的寺碑、经幢、墓志以及有关修炼参佛的体会文字，但由于佛教在辽代也很盛行并且受到统治阶级的尊崇，出家人的地位很高，也不同于一般的百姓。只有皇族贵戚以及山门中人才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并且有时间有财力创作作品流传下来，这在普通百姓是不可企及的。

再次，从文字应用来看，以汉文作品居多，有少量的金石作品是使用契丹、汉两种文字对照刻写的，却没有一本单纯用契丹文书写并流传下来的文本著作，契丹文作品只能在史书记载中找到影子。抛开时间对于文本流传的损害以及外部因素如政治、战争等的迫害性，从内部看，契丹文字存在的时间不长而且它的创制太有针对性，就是为政治、为契丹民族服务的，因此更长久的时间里用不上它、更广阔的空间里不会用它、更庞大的人群里可能见不着它，所以它的著作难以流传，而缺乏著作的文字也会难以流传，这是必然的状况和规律。

最后，从语言风格来看，显著的特点是辽语和汉语的夹杂，作品多是汉字的，但用词用语又与汉文迥然不同。在用汉文无法传达或汉文缺失对应用语的情况下，流露出来的是清新自然的契丹语口语；随着对汉文化的加深了解和汉语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在吸收着汉文的写作方式，又有变化，如由简单直白到复杂含蓄的文风、由纯应用型到写景抒怀的内容、由单纯的叙述白描到多种修辞手法并用，形成了辽代散文的独特风格。

第四节 书禁政策

辽王朝存立于中国的时代是民族政权并立、民族势力相对均衡的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宋在文化上有明显的优势，辽、金、夏在军事上又表现出阶段性的强势，为了在竞争中取胜，政权之间都采取了某些政策措施来保存并强大自我，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书禁政策。书禁政策虽然不是语用上的实例，但反映了政权对于语言文字所采取的态度，所以专列一节加以说明。

书禁政策并非辽的专属，当时的宋、金、夏都有或多或少类似的措施，而且辽之前的历代王朝也有或明或暗的书禁之策。今人关于辽代的书禁究竟有无、是否强令都有不同看法，主要的材料如下：

1、曾于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 1075 年）出使过辽国的沈括在其所著《梦溪笔谈》上说："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①]

2、《辽史》载，辽道宗清宁十年冬十月戊午，发布了"禁民私刊印文字"[②]的

[①] [宋] 沈括.《梦溪笔谈》：卷 15. 文渊阁四库本。
[②] [元] 脱脱.《辽史·道宗本纪二》：卷 2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 264 页。

法令。

3、厉鹗《辽史拾遗》："（辽）书有厉禁不得入中朝乎。"[①]

4、清代永瑢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时指出："辽制，国人著作，不得传于邻境，故五京兵燹，荡然无存。"[②]

5、缪荃孙《辽文存·序》："契丹开国，久于完颜，文教之彰，使命之美，亦与完颜仿佛。惟辽时书禁甚严，不准传邻邦。五京兵燹，缣帛扫地。"[③]

6、周春《增订辽诗话》、陈衍《辽诗纪事序》也对书禁一事言之凿凿。

7、《辽史》："（东丹王耶律倍）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④]

8、《新五代史》："（东丹王突欲）自契丹归中国，载书卷千卷，枢密使赵延寿每假其异书、医经，皆中国所无者。"[⑤]

上述1—6条材料都说到辽代有书禁政策，但3—6可能是由1推演出来的，由于沈括确实出使过契丹，所以后人多数认为其言可信。1、3、4、5、6是说辽自己所刊行的书籍严禁传入别国，尤其不得入宋境，2是说辽政府禁止民间私自刊行书籍，这是辽书禁政策的两项内容。

黄震云在《论辽代诗》中则有不同见解，认为从现存辽代文史著作中无法找到一条法律是严禁书籍出境的，所以很有可能是误传。又见材料7提到东丹王于市集购书，可见当时市场买书不是违法行为。关于材料2，颁行法令的目的只是为了整理经典，同一年（清宁十年）十一月即诏乾文阁所缺经籍，命儒臣校仇。辽代还多次正校《五经》，表明当时儒家经典流传广而杂，国家才有必要统一整理和刊行。同时表明道宗十年前是不管民间私刻印文字的。[⑥]

那么，辽代的书禁之策究竟如何呢？我有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辽代关于严禁书籍出境的政策应该是存在的，这由当时的外交形势所决定。宋辽之间常有战事发生，涉及到有关国家或军事上的机密可能外泄的问题，书禁是必然的措施。宋就禁止书籍传入辽境，当看到辽地有许多宋的书籍时，大宋的君臣都表现出无比的忧虑，同理推知，辽采取与宋类似的书禁之策也不足为奇，而且辽创制自己的民族文字还有一个附带的作用也是防止机密外泄。但是，两国之间在没有战争的时间里是有互市的，书籍的交易在所难免，而且由于书禁的缘故，贩书的利润是很高的，私贩的数量也不少，所以在和平期间书禁政策是并不严格的，材料7、8提到东丹王购书之巨就可以解释了，而且以东丹王的身份与普通百姓又是不同的。沈括所言"法皆死"当是在战争期间，很有可能是临时抓获就被军事处理了，所以史料上没有法律条款，也未见有因犯此条罪状而处

---

① [清] 厉鹗.《辽史拾遗·自序》. 广雅丛书本，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 第1页。

② [清] 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5.《史部一·正史类·辽史一百十六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

③ [清] 缪荃孙.《辽文存·序》.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第1页。

④ [元] 脱脱.《辽史·宗室传》：卷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1211页。

⑤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卷72. 北京：中华书局，1974. 第901页。

⑥ 黄震云.《论辽代诗》.《文学评论》，1994，01期:第39页。

死的案例，当然也有可能是辽代史料遗失严重之故。

第二，禁止民间私刊图书也是有的，从上文材料 2 可以得出。辽统治者为了维护国家的一统，在思想文化上会自然而然地开始制约民众，这从历代辽帝都推崇儒教可见一斑。因此，为了建立国内统一的文化价值取向，适时地禁止民间私刻图书，而由国家官印也是必然之举。当然，官印是远远无法满足民间需求的，民间的私印从未停止，而国家的法令也只是在有些时候颁出来强调一下，适当改变民间私印的混乱情况。

由于辽代各项史料缺失或不明的情况十分严重，后人将原因归于书禁政策的严格，其实未必，宋、金、夏皆有书禁政策，也未见宋的史料缺乏或者是文事落后，书禁之策是原因之一，但决不是唯一。毋庸置疑的是，辽的书禁政策对于契丹语言文字以及文化的传播是有阻碍作用的。

结　语

樊树志先生在其《国史概要》一书中提到："为了抵制汉化，契丹人尽力保持自己的制度、礼仪乃至生活方式，他们自觉地不说汉话，以免被淹没在汉族的汪洋大海之中。"[①]而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则说："辽国直是一个汉族分化的国家。"[②]两位学者的意见都是准确的，综合看来，这里提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矛盾：不希望被完全汉化的契丹民族，留给历史的整体印象是最终在事实上还是成为了一个汉族的分化之国。不但契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少数民族无一例外地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想要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质，却又不免被强势民族所融化。扩展至世界史，少数民族与强势民族的关系大抵如此。这一特点在前文的内容中都能体现无疑。

首先，主观愿望上契丹人极力保持说契丹语，全国上下也为此做了很多推广契丹语的工作，不仅自己说，也希望生活在契丹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们也说契丹语，甚至还教远道而来的外宾们学习契丹语。在表层上，这项工作应该说完成得很好，今天我们看到契丹语在历史上确实成为了一门颇具系统性的成熟语言，而且声名远播，就是明证。但是往深一层次看，准确地说这项工作又是不可能很好完成的，为了生存的需要，为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因素，为了民族的存在，汉语的学习和使用对于契丹民族来说又是必然的，而且有势必逐渐扩大的趋势。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熟练掌握汉语的往往是皇族和契丹上层的有识之士，尤其是皇帝本人，把握契丹民族命运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

其次，契丹文的创制也很能说明问题的所在。制字的初衷是为了记录契丹语和保存契丹民族中最具特制的民族文化，然而制来制去，总也逃不开汉字的影响；更令人哑然的是，专门制字一场，流传于世的文字资料仍然几乎是汉文的，能够流传下来的契丹字寥寥无几。

最后，无论主动或是被动，无论自觉或是不自觉，契丹人本无避讳，却在不经意中避起讳来；契丹人无法用契丹语传达出的情感，用汉诗传达出来了；契丹人的书禁政策本来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结果却导致自己的文化之路走得更短暂。

因此，历史的发展自有它的规律，条件具备了，该出现的、该消失的都会自然实现，都不是个别人、个别集团，甚至个别国家所可以左右的。但是也不必为此懊恼，以为人的努力都是徒劳。事实上，只要发生过的总会留下痕迹。我们今天还记得契丹民族的伟大事迹、记得契丹语、记得契丹文的创制，甚至记得寻找契丹民族的后裔、记得追溯今天达斡尔语等民族语的来源是契丹语等等。正好印证了人的贡献在历史上的不可磨灭。

---

① 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第246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517页。

契丹语本身作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在历史上出现，一方面面临着强大汉语的威胁，一方面它又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力渗透到汉语之中。汉语发展到今天，早已不再纯粹，是各个民族语言相互接触、融合的结果。一种语言的走向，强大或是衰落，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的发展，无论走向如何，也是没有好坏对错之分的，只是顺应时代、社会的历史要求而已。

参考文献

（一）古籍

[1]［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宋］沈括.《梦溪笔谈》.文渊阁四库本。

[3]［宋］王群之.《渑水燕谈录》.文渊阁四库本。

[4]［宋］余靖.《武溪集》.文渊阁四库本。

[5]［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文渊阁四库本。

[6]［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文渊阁四库本。

[7]［宋］叶隆礼.《契丹国志》.扫叶山房校刊本。

[10]［宋］苏辙.《栾城集》.上海：上海书店，1893。

[11]［宋］欧阳修.《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13]［宋]洪迈.《契丹诵诗》.《夷坚志·三丙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4]［宋］彭大雅撰，徐霆疏证.《黑鞑事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6]［宋］王溥.《五代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98。

[17]［元］脱脱.《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元］脱脱.《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19]［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20]［明］杨循吉.《辽小史》.辽海丛书本，辽海书社印行。

[21]［清］厉鹗.《辽史拾遗》.广雅丛书本，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

[22]［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

[23]［清］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4]［清］缪荃孙.《辽文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5] 蒋祖怡，张涤云整理.《全辽诗话》.长沙：岳麓书社,1992。

（二）专著

（一）国外著作

[1]［韩国］金富轼著，李贞培校勘.《三国史记》：卷18.汉城：民族文化推进会发行，1982。

[2]［日］田村造实.《契丹文字的创制》.《东洋文化史大系》:诚文堂新光社版,1938。

[3]［日］爱宕松男著，邢复礼译.《契丹古代史研究》.乌鲁木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

[4]［德］付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二）国内著作

[1]闻一多.《管子集校·叙录》.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2]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张正明.《契丹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79。
[4]蔡美彪.《中国通史》:第六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杨树森.《辽史简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6]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陈述.《契丹政治史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9]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
[10]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11]孟志东.《云南契丹后裔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2]李桂芝.《辽金简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13]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4]陈垣.《史讳举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15]聂鸿音.《中国文字概略》.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16]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17]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
[18]黄震云.《辽代文史新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9]丁石庆.《双语文化论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0]赵丽明，黄国营.《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21]赵丽明，黄国营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22]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3]聂鸿音.《塞北三朝》.北京：中华书局,2001。

（三）论文

[1]金光平，曾毅公.《锦西西孤山之契丹文墓誌试释》.《考古学报》，1957，02期。
[2]刘凤翥.《建国三十年来我国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01期。
[3]刘凤翥.《最近十年我国契丹文字的研究状况》.《民族研究动态》，1983，04期。
[4]刘凤翥.《辽代语言和文字》.《博物馆研究》,1984，02期。
[5]贾敬颜.《契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6]刘凤翥，于宝林.《中国八十年代契丹文字研究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7]杨毓骧.《云南契丹小字的遗存与释义》.《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04 期。
[8]黄震云.《论辽代诗》.《文学评论》，1994，01 期。
[9]聂鸿音.《辽代诗文用韵考》.《满语研究》,1999,02 期。
[10]聂鸿音.《契丹语的名词附加成分-n 和-in》.《民族语文》,2001,02 期。
[11]聂鸿音.《〈夷坚志〉契丹诵诗新证》.《满语研究》,2001,02 期。
[12]黄震云.《论辽代散文》.《社会科学战线》，2001，05 期。
[13]张振中.《"契丹天书"何时揭开你的红盖头》.上海档案。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1] 中央民族大学首届“博学杯”研究生学术论文大赛二等奖，2004 年 11 月，《辽代契丹境内双语语用探源》，署名陈文俊。

[2] 张公瑾主编，211 工程系列图书之《浑沌学与语言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6 月，《佛教语言的浑沌观》，署名陈文俊。

后 记

时光飞逝，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也接近尾声，在感叹岁月流逝的同时，更满怀收获的喜悦。

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习生活使我受益匪浅，三年来，在各位老师的教导、关怀和帮助下，使我在思想、学业和个人能力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这一切都为我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我的导师丁石庆、张铁山、关辛秋三位老师在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事上给予了我莫大的关怀、帮助和启迪。从论文的选题、结构的安排、资料的收集整理、观点的提出到最后定稿，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三位老师的心血，体现着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要求自我的处事风格，这一切也将使我受益终身。

此外，我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的各位领导，尤其是管理研究生工作的阿孜古丽老师，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要感谢几位校外的学者和老师，能在百忙之中阅读我的论文并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以及参与对我的论文评审；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在查阅相关资料方面给予的支持。感谢所有教导、支持、鼓励我的老师和同学们，正是他们的无私帮助，本人最终完成了这篇毕业论文的创作。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况且由于客观条件以及个人能力的限制，文中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还望得到各位老师和同学的批评和指正。

陈文俊

2005 年 5 月

于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本人声明：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对前人及其他人员对本文的启发和贡献已在论文中作出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和其它机构已经发表或者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本人同意学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保留本人学位论文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资料库送交论文或者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中央民族大学可以将本人学位论文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复制手段和汇编学位论文（保密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陈文俊　　日期：2005年5月26日